

中国哲学史的再开拓：语言哲学

李开

内容提要 90年来借鉴西学研究中国哲学史的做法是可取的，现在应对中哲史研究作再开拓：除了继续从子书，还应从经书、小学书、古代注疏中找材料，形成语言哲学的新路。本文通过举例，围绕名、字书、注疏体裁相关内容，具体阐述了中国古代语言哲学问题。

关键词 中国哲学史 名、字书和注疏 西学 中国古代语言哲学

李开，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210093

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从谢无量1916年著《中国哲学史》算起，至今已有90年历史。90年来的成果足以写成一部中国哲学史的学术研究史，90年来的研究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以西方哲学中的本体论、价值观和二元对立逻辑式为维度来作对象化的研究，谢无量是以“本体论思维”解读“中国哲学”的，此后，胡适1919年著《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上海商务印书馆版)以实用主义为框架，冯友兰1931至1934年著《中国哲学史》(？……1961年中华书局版)，1939年著《新理学》(上海商务印书馆版)，以柏拉图理念论和罗素等人的新实在论为深层次检式^[1]。任继愈著《中国哲学史》(1966年中华书局版)以黑格尔的二元对立论逻辑式，特别是唯物唯心对立、阶级对立为贯穿线索。90年来的学术史，走了一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道路，尽管多有曲折，但取得的成就是主要的。“中体西用”是晚清以来对中国学术应

走和必走之路的经典表述。随着时代的变迁，“中体西用”可以有新的内容，因学科的不同，可以有程度的深浅，但其“体”之主干，“用”之工具、方法和逻辑思想是难以而定的。说来也很巧，在近代学术史上，“中体”的新知和“西用”的引进是同时发生的，《马氏文通》问世的那年，1898年，甲骨文字出土，敦煌藏经洞发现，不久又有简牍的发现(1901、1904)，明清两朝皇家内库档案(1904、1905，其中已藏有西洋画师的作品)的发现。也就在1898年，严复翻译的赫胥黎(1825—1895)的《天演论》出版。1902年前后，严译斯宾塞(1820—1903)《群学肄言》、严译穆勒(1806—1873)《名学》、《群己权界论》(原书名《论自由》)等出版。1905年王国维在《静安文集》中发表他研究叔本华的成果。1926年王国维《古史新证》提出“二重证据法”(一说1915年已提出)，固然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系列古史新材料的发现有关，实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一般项目“《仪礼》经注语史汇考”(05JA740017)成果

生活与世界境域“之中”的良知

——王阳明良知说的现象学分析

林丹

内容提要 王阳明良知说内在地包含了“心即理”和“知行合一”这两大核心思想。良知不是近代西方形而上学中的“主体性”的“自我立法”。它是德性的切身化与世界的境域化的交融合一，是生活“之中”显发出来的“生活之‘道’、生命之‘道’”。

关键词 良知 主体性 现象学 生活

林丹 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210097

据《阳明年谱》记载，正德十六年（1521年），王阳明在江西，“是年先生始揭致良知之教”^[1]。阳明晚年提出的“致良知”，具有总结性的意义。阳明思想中的“心”往往意味着对于生活境域的“投入”和切己的领会^[2]，而首先不是主体性的、观念化的理性思维，更不是“主观意志”。“心”也不是一个静态的结构，不是“实体”（substance），不是固定的“是”或“是其所是”。“心即理”这一命题的内在涵义是，把“理”置于直接可领会的生活境域之中。此“理”是生活境域中的“活理”，不再是脱离构成域的概念本质和规律。这样的“活理”自然导向“知行合一”。然而在“心即理”这一命题本身中却不容易看到这些特征。“知行合一”之说，虽然并非只要“知”那狭义的“伦理道德”，但毕竟也非欲泛知天下之“物理”；需有一收敛到本已生命的过程。所有这些特征和任务都由“良知”或“致良知”说体现出来了。

一、“良知”与“致良知”的基本涵义

阳明说到：“良知者心之本体。”（《全集》，第

61页）“良知”是心的原本状态；故良知说自然包含了“心即理”之义。良知与“理”或“天理”也就必有“紧切”的关系：“良知是天理之昭明灵觉处，故良知即是天理。（《全集》，第72页）“昭明灵觉”不同于对象化的认识，并非良知为“主体”，天理为“客体”，主体与客体之间发生一种“认识”关系。它就是理或天理本身的“敞开”、“敞亮”，这一敞开又是在作为“心之本体”、即心的原本状态之中运行的，此为“良知即是天理”。因而，“良知者，孟子所谓‘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者也。是非之心，不待虑而知，不待学而能，是故谓之良知。是乃天命之性，吾心之本体，自然灵昭明觉者也。”（《全集》，第791页）

阳明又说：“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全集》，第6页）吾心在生活境遇之中总是已有所知。但这种“知”不能被现成化，此“知”只是有待进一步构成的发生可能而已，并非我已然掌握了一套固定的“知识”。良知亦是如此，它总已有所知，但它又总是

海德格尔的壶之虚空与中国诗性文化的会通处

孙迎光

内容提要 本文从五个方面分析了海德格尔的壶之虚空：虚空是不可定义的，它具有颠覆西方理性哲学的关于存在的形而上学的重要意义；虚空不是物理学上的空间概念，它是结缘性虚空；作为存在本质的虚空是虚实相生的；虚空聚集着四重整体，人的栖居保护着四重整体；虚空靠诗性思维来把握。结合上述分析，指出了海德格尔思想与中国诗性文化有相通之处。从中国诗性文化的角度谈海德格尔的壶之虚空，旨在为理解海德格尔哲学提供一个视角。

关键词 诗性思维 虚空 物

孙迎光，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210097

海德格尔的哲学是诗与思的对话，《老子》的思想也是诗与思的对话。《老子》四十一章指出：“道隐无名”。意思是道幽隐而无名。海德格尔指出：“但若人要再度进入存在的近旁，那么他必须先学会在无名中生存。”^[1]道家的思想主题之一是“无”，德国学者莱因哈德·梅依指出：“对于海德格尔来说，其思想的首要论题，是与存在相应的‘无’这一主题。”^[2]海德格尔正是在壶的“无”（虚空）中揭示了壶这一物。海德格尔思想与中国诗性文化有会通之处。本文从中国诗性文化看海德格尔的壶之虚空，旨在为理解海德格尔哲学提供一个视角。

海德格尔在其《物》一文中的壶之思可能借鉴了《老子》的思想。张祥龙先生指出：“1946年夏天，海德格尔与中国学者萧师毅合作，要将《老子》或《道德经》译成德文。此次短暂合作以失败告终。”^[3]“尽管这次合作没有取得翻译成果，却深

远地影响了海德格尔，形成他与道家关系中的最大一段因缘。”^[4]

在海德格尔看来，壶能成为一物，在于它是作为有容纳作用的器皿而存在，他说：“当我们装满壶时，我们发觉这个器皿的容纳作用。显然是壶底和壶壁承担着容纳作用。但别忙！当我们装满一壶酒时，难道是在把酒注入壶壁和壶底么？我们顶多能说，我们把酒倒在壶壁之间、壶底之上。壶壁和壶底当然是这个器皿中不透水的部分。不过，不透水的东西还不是起容纳作用的东西。当我们灌满壶时，液体就在充灌时流入空的壶中。虚空乃是器皿的有容纳作用的东西。壶的虚空，壶的这种无，乃是壶作为容纳的器皿之所是。”^[5]

这很容易让人联想起《老子》十一章所说的“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意思是使用陶泥制作器皿，有了器皿中间的虚空，才有器皿的

先秦儒家德性思想的演进

程平源

内容提要 “德”之初是先民刻画种子发芽以求得庄稼成长的一个巫术，随着氏族部落的产生，“德”发展为“图腾崇拜”（祖先崇拜），在殷代甲骨文中“德”正是“祖先祭祀”的意思。西周“德”义从单纯的“（牛羊）祭祀”改良为“心、行”祭祀，春秋“德”义开始祛魅：（1）孔子以“仁”代“德”，用他的“仁”观念将周公之“德”人文化。（2）子思在“德之行”的基础上首唱“五行学说”，全面开启了儒家天人之学、心性之论、王政之道。

关键词 德 祖先祭祀 德行 德之行 德性

程平源，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后 210093

“德”是先秦典籍中的重要语词，也是研究先秦哲学、思想无法绕开的重要概念。“早期经典中‘德’的概念确实使人大惑不解。许多学者也始终没有弄懂‘德’是什么，结果往往把它一笔带过”^[1]，或者直接用人文化的“德”义之“道德、德行、德性”去解释早期文献中的“德”。当我们以“道德、德行、德性”去解释早期文献中的“德”时，时常会困惑于这种解释的似是而非与含混不清，更重要的是这种解释会遮盖真相，似乎传说时代、载籍以来中国就是在“德治”之下的人文乐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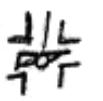
由于“几千年的中国，对于文字似乎总有一种神秘和崇敬的态度，从文字象形进行联想式的意义解释，从借用文字象形而构造神秘图符，到由文字的形状构造来预测吉凶，在‘大传统’和‘小传统’中，文字对思想的影响处处可见”^[2]。因此本文将语义演进的角度考察先秦“德”义的起源和嬗变，并由此阐述儒家德性思想的演进。

一、德：一个丰收的巫术

殷商之前，“德”未形诸文字，对文字之前的德观念的产生只有述求于人类学的分析。

观察甲骨文的“德”字字形和金文的“德”字字形，不难发现其字形虽不乏差异，但其中有个自始至终未变的字符，就是“皿”（一“臣形目”，目上有一竖）。

甲骨文：



（甲 2304）

金文：



孟鼎



辛鼎



毛公鼎

多数文字学家都认为“目”乃是“眼睛”的象形，其造字的初义乃是“举目正神”，因此将此字符隶定为“直”。何新认为“德”之初文从目从丨，象目正视一条直线，因此德的本义为“正直”^[3]，斯

苏格拉底对“子告父”表示赞赏吗？

——就柏拉图《欧绪弗洛篇》的“虔敬”问题等商榷于邓晓芒教授

林桂榛

内容提要 邓晓芒教授《再议“亲亲相隐”的腐败倾向》一文误解了孔子文本与儒家主张，也误解了西方经典与先哲苏格拉底。儒家的“互隐”主张是沉默性质的不举证而非无原则的一味庇护。《欧绪弗洛篇》中苏格拉底对欧绪弗洛的追问，瓦解了欧的虔敬观，也否定了神灵体系下为欧所得意的“讼父杀人是神圣的”的道德立场，展示了“苏格拉底讽刺”及苏氏“辩证法”的清晰风格。邓文对苏论辩只在“理性”而无关乎道德立场的解读及苏氏赞成甚至鼓励欧告父的判定，两者自相矛盾，且漠视其“神圣→虔敬→公正”的论辩理路及苏“美德即知识”的致思精神。

关键词 孔子 苏格拉底 欧绪弗洛 告发 神圣 虔敬 公正

林桂榛，徐州师范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 221000

《学海》2007年第1期发表了邓晓芒教授《再议“亲亲相隐”的腐败倾向——评郭齐勇主编的〈儒家伦理争鸣集〉》一文(以下简称“邓文”)，全文分四部分，三万五千余字。那么邓文是否澄清了“亲亲相隐”？是否澄清了儒家的“容隐”主张？尤其是否澄清了他意欲“来作一个基本的澄清”^[1](第5页)的《欧绪弗洛篇》^[2]的解读问题呢？即苏格拉底对“子告父”真的表示赞赏吗？范忠信、郭齐勇、杨泽波等先生的见解真的是“对柏拉图《游叙弗伦篇》的一个惊人的误解”(第5页)吗？

—

邓文讨论“亲亲相隐”问题时的缺失是：对“亲亲相隐”进行思考及行文时，未就“亲亲相隐”的具体所指作严肃的学术分疏，未厘清作为经典叙述的“亲隐”、作为制度叙述的“亲隐”、作为人

性叙述的“亲隐”这三者的区隔，混淆先秦儒家的主张、历朝法制的设置、普遍人性的倾向，盲目将制度上的“亲隐”、人性上的“亲隐”完全等同于经学文本中的儒家“亲隐”主张，仿佛古代“亲属容隐”之法于今看来不是合理的地方，仿佛现实生活中“腐败”等不良现象及人性中庇护亲属的天然倾向，都是孔孟“教导”所致，果真如此吗？

①作为经典叙述(经学)的“亲亲相隐”，本自《论语·子路》：“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②作为制度叙述的“亲亲相隐”，本自《汉书·宣帝纪》：“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孙，罪殊死，皆上请廷尉以闻。”汉后，历朝刑律于举证、藏匿、诬告亲属等皆有详细规定，今视之合理、不合理处皆有，不可

人格面具与道德认同危机

马向真

内容提要 人格面具是荣格提出的一种原型。人格面具有双重作用，是社会生活与公共生活的基础，但是人格面具过分发达时，会压抑人格中的其它方面。人格面具的两种膨胀方式相应地在道德认同危机方面引起两种反应。人格整合与和谐为道德认同提供了基础。

关键词 人格面具 道德认同 整体人格 和谐人格

马向真，东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210096

一、人格面具与荣格的原型理论

人格面具是瑞士心理学家荣格（1875—1961）提出的一种原型。荣格是分析心理学的创立者，因其集体无意识和原型的理论而声名远扬。

荣格把整个人格结构划分为意识、个体无意识和集体无意识。意识以自我(ego)为核心，是人格结构的最顶层，指我们所意识到的一切东西，是人的心灵中唯一能够被个体直接感知的部分。荣格将集体无意识与个体无意识进行了比较：“我们能区别个体无意识，它包括了个人的所有习得经验——被压抑了的、被遗忘了的知觉、思想和情感。但是，在个体内心，还存在着其他未在个体无意识中发现的内容，它们通过遗传存在于心理机能和人脑结构中。”^[1]在荣格看来，集体无意识不仅包括了人类种族历史，而且留下了人类祖先——动物的痕迹。它是整个人类进步发展的心理残余，也是许多世代不断重复再现的经验的

残余。整个人类都或多或少具有集体无意识。集体无意识在无意识的深层，既不为个人所自知，也不属于个人所独有，是人类在种族演化中长期留传下来的一种普遍存在的原始意象。荣格称此等原始意象为原型。

在荣格看来，非个人特性是原型的一种最基本的特性，原型具有内容和行为的习惯，这些内容和习惯在所有的个人中都是存在的，相同的，从而构成了一个超越个人本质的、共同的精神实体，这一实体普遍地存在于我们个人之中。同时荣格又指出，其中绝大部分是不能被意识的。

荣格原型学说中有几个重要的原型：人格面具(persona)、阴影(shadow)和自性(self)。人格面具这个词的本义是演员为了角色塑造的需要而配戴的面具。荣格将其作为人格中的一种重要原型是基于与人格面具本义的某种相似性。“人格面具是一个人公开展示的一面，其目的在于给人一个很好的印象以便得到社会的承认。”^[2]人是社会

比较优势理论与中国第三部门的研究

黄黎若莲 张时飞 唐 钧

内容提要 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体制，不仅是企业改革和经济增长的事。当经济增长取得长足进步时，就必然会对其他领域，尤其是社会领域产生影响。如果社会领域的改革跟不上，具体而言，就是老百姓在社会领域的基本需求得不到满足的时候，经济增长带来的社会结果很可能异化甚至走向其反面。从国际经验和中国 20 多年来的改革实践看，一个能够自我生存和自我发展的“社会领域”，可能也应该是一个独立于政府和市场之外的“部门”。本文以英国伦敦经济学院的比尔斯和格伦内斯特提出的关于“第三部门”的“比较优势理论”为理论框架来讨论国内学术界对“第三部门”的认识以及“第三部门”在我国的发展现状，并对此作出了理论上的归纳。

关键词 比较优势理论 中国 第三部门

黄黎若莲，香港城市大学公共与社会政策系教授

张时飞，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研究员 100732

唐 钧，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 100732

从计划经济体制走向市场经济体制，不仅仅是企业改革和经济增长的事。当我们的经济增长已经取得了长足进步的时候，就必然会对其他领域，尤其是社会领域产生影响。如果社会领域的改革跟不上，具体而言，就是老百姓在社会领域的基本需求得不到满足，或曰老百姓的社会权利不能实现的时候，经济增长带来的社会结果很可能异化甚至走向其反面。

要在社会领域产生与经济增长相互适应、相互配合、相互促进的积极变化，就必须要进行更深层次的社会改革。从国际上社会政策理论的近

期发展和发达国家的经验看，也从中国 20 多年的改革实践看，一个能够自我生存和自我发展的“社会领域”，可能也应该是一个独立于政府和市场之外的“部门”。于是，在作“十一五”规划时，一个崭新的概念，“政社分开”被推出。

虽然这个概念目前也许并没有被中国政府和社会普遍接受，但其旺盛的生命力应该是毋庸置疑的。一个独立的“市场”部门终于站起来了，这可能中国经济能够快速增长的一个深层次的“秘诀”。作一个理论假设，如果有一个独立的“社会”部门（第三部门）也能够站起来，中国的社

社会政策创新与中国的策略选择

张秀兰 徐月宾 张玉荣

内容提要 自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提出以来,我国政府迅速推开了一系列针对贫困人群的社会救助制度,这些措施无疑会对改善贫困人群的基本生活和权益做出贡献,也为社会发展提供机遇。然而,中国的社会政策发展仍面临多方挑战。一方面,一些传统的应对市场经济风险的社会政策工具,在我国的使用效果非常有限;另一方面,由于一些基础性的社会制度的缺陷或缺乏,诸如规范的市场经济秩序、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健全的法制环境以及基于民主政治的公共和私人利益的表达和实现机制等,这使我国社会政策的作用和效果也受到了制约。为此,文章认为,中国的社会政策要从基础制度的建立和改善入手,在此基础上从中长期战略的视角出发,从人力资本投资的角度来制定和实施社会政策。

关键词 中国 社会政策 社会保障 策略选择

张秀兰,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研究所教授 100875

徐月宾,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研究所教授 100875

张玉荣,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100875

一、社会政策创新:全球化形势下提升国家竞争能力的工具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创新”是国际社会政策领域中的一个最显著的特征。社会政策的概念和形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宽泛或丰富了很多。从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等较传统的概念和理论到近年来各种社会保护框架的提出,社会政策的内容和形势可以说无所不包。在近年来逐步完善的一些社会保护框架中,社会政策与经济政策已经融为一体,并由此而衍生出很多新的社会政策概念和理论。虽然不同社会保护框架的概念和策

略有不同,但它们共同的一个特点就是强调社会政策对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因此,这些新的社会政策也称之为发展型社会政策,目前很多欧洲国家及社会政策改革正在朝着这个方向发展。简单来说,发展型社会政策之所以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政府的重视,是因为它为政府在新的形势下提供社会福利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础,即社会政策具有社会投资的作用,特别是通过对人力资本的投资而提高劳动力的素质,而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则是政府和市场的双赢,即不仅有助于企业竞争力的提高,也可以起到从根本上消除贫困,增强国家竞争能力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作用。

国家力量、社会结构与文化传统

——中国、日本和韩国福利范式的理论探索与比较分析

熊跃根

内容提要 本文以中国、日本和韩国三国为分析对象,从比较的层面出发,对上述三个东亚国家的社会福利体制和社会政策经验进行理论分析,同时也侧重政治经济分析和社会学的诠释。作者主要从以下三个内涵来理解中国、日本和韩国福利范式的内涵与特征,即国家力量、社会结构和文化传统的交织作用对福利体制和社会政策的核心影响。作者认为,作为东亚国家,中国、日本和韩国三国的福利范式并不是同一类型,虽然人们笼统将它们三者归类为“东亚福利模式”,但它们各自仍具有自身鲜明的特殊性,这些特殊性或差异是与它们各自不同的历史经验、文化传统、社会结构和政治经济过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并就此展开了讨论。

关键词 东亚国家 福利范式 国家力量 社会结构 文化传统

熊跃根,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 100871

一、研究问题的提出

自丹麦学者阿斯平-安德森在上个世纪 80 年代末发表开创性的论文以来,有关“福利范式”(Welfare regimes)就开始频繁进入福利国家和社会政策国际比较研究的讨论当中,并成为了分析不同福利体制和制度类型的不断被借鉴的一个概念工具,也成为研究者验证不同福利模式实际表现的一种分析模型(Esping-Andersen, 1989; 1990; Goodin, 1999)。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有关福利范式的比较研究多集中在对资本主义福利

国家内部的理论讨论和经验论证,而较少关注非福利国家和西方之外的社会的福利类型和政策经验。直到最近几年学者们开始关注这一理论分析工具或分析模型,在新福利国家或非西方社会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应用(Huber, 1996; Goodman and Peng, 1996; Standing, 1996)。同时,在讨论福利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福利支出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时,早期的研究证实了经济发展与福利支出之间的正相关关系(Wilensky, 1965)。然而,在考察一些发展中的工业化国家的经验时,这样的论断却受到学者的质疑(Midgley, 1985)。历史和现

感谢杨团教授对本文提出的意見和建议。同时,作者也从武川正吾教授、埋桥孝文教授、沈杰教授、金渊明教授、林卡教授等学者的发言中得到启发,在此表示致谢。

养老保障·居家养老·社区支持：

养老模式的新选择

邹农俭

内容提要 本文不同意时下有人提出的所谓“社区养老”的模式，认为仅靠社区是难以承担繁重的养老任务的，而主张养老保障加上居家养老再加上社区支持的模式。我们认为养老保障就是国家要通过立法，将养老纳入社会保障体制的范畴，用法律的形式确保养老成为政府、全社会的一项事业；居家养老就是老年人依然居住在自己或子女的家里，家庭仍承担养老的一部分功能；社区支持是指附近的社区要为老年人提供多种服务。我们希望它能成为养老的一种新选择。

关键词 养老保障 居家养老 社区支持

邹农俭，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 210097

一、老龄社会：伴随现代化而来

1999年10月，我国正式进入老龄社会，2000年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总数已达1.3亿，占总人口的10.6%，65岁以上老年人占总人口的7%。从此开始了老年人口持续增加的历史新阶段。我国目前的老年人口占世界老年人口总量的20%多，占了整个亚洲老年人口的50%。据预测，到2010年，老年人口将达到1.4亿，2015年，将达到1.63亿人，2025年，将达到2.3亿人，到2040年，我国老年人口总数将达3.74亿人，占总人口的24.4%，2050年将达到4.2亿人，占总人口的27.4%，达到老龄化的峰值，从此还将在老年人口数高位上持续一段时间。

世界上总人口超过一亿的国家为九个，而我国在数十年内老年人口就有几个亿，有这么多老

年人口的国家，为世界仅见，因此她是名副其实的老年人口大国，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可以肯定地说，老龄社会的特征、影响，今后在我国将更加明显，老龄化带来的问题将更加突出，解决这些问题也会更加艰难一些。

研究显示：我国老龄化社会具有这么几个明显的特征：

一是老年人口数量巨大，延续时间长。从本世纪初起，我国老年人口总数在一至四个亿，一个国家拥有几个亿的老年人口的时间将延续四五十年，这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应对老龄化是一个从未遇到过的大题、难题。

二是老年人增长速度快。从1999年进入老龄化社会之后，老年人口的增长速度异常快速，绝对量差不多十年增加一个亿。再过三、四十年，老年人口达到峰值后数量高达三、四亿的老年人

国家生态安全的现实困境与对策思考

高中华

内容提要 国家生态安全无疑是 21 世纪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各个国家在经济现代化进程中难以避免的“生态环境支出”或“环境安全交换”，发达国家在扩张过程中滞留的“环境副遗产”等都应是影响国家生态安全的主要内容。所以，人类必须树立一种全新的生态安全观，通过加强多层面的通力合作，改变粗放的经济增长模式，最终实现生活与生产方式的“绿化”。

关键词 国家生态安全 现实困境 对策思考

高中华，徐州师范大学图书馆教授 221000

关于生态安全亦称环境安全、生态环境安全，有时被冠以国家职能的含义，又称为国家生态安全或国家环境安全，是指一个国家生存和发展所需的生态环境处于不受或少受破坏与威胁的状态。具体说，是指一个国家保持土地、水源、矿产、大气等“自然资本”的保值增值、永续利用，使之适应国民教育水平、健康状况体现的“人力资本”和机器、工厂、建筑等体现的“创造资本”持续增长的配比要求，避免因自然衰竭、资源生产率下降、环境污染和退化给社会生活和生产造成的短期灾害和长期不利影响，甚至危及国家军事、政治和经济安全。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生态破坏将使人们丧失大量适于生存的空间，并由此产生大量生态灾民而冲击周边社会的稳定。可见，生态安全是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我国规范性文件中正式提出国家生态环境安全的概念，始见于国务院发布的《全国生态环境保护纲要》，这是我国首次将生态安全作为环境保护的目标，纳入国家安全的范畴。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纲要》中，生态安全是指国家生存和发展所需的生态环境处于不受或少受破坏与威胁的状态，“(如果)生态环境继续恶化，将严重影响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国家生态环境安全。”全国人大环境资源委员会主任曲格平先生将生态安全作为国家安全的基础条件，并指出生态安全主要包括四大问题，即国土安全、水安全、环境安全和生物安全。

早在 1977 年，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主任莱斯特·布朗在《重新界定国家安全》一文中就将环境问题与安全概念联系到一起。同年，米塞等人出版的《迈向人类世界秩序：超越国家安全束缚》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研究与实证检验

薛求知 朱吉庆

内容提要 伴随着中国经济国际竞争力的不断增强和“走出去”战略的逐步实施，中国已成为新兴的对外直接投资来源地。本文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与特征进行了系统分析，并就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和对外直接投资发展阶段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以此判断分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所处的阶段及未来走势。

关键词 对外直接投资 投资发展阶段 “走出去”战略

薛求知，复旦大学管理学院教授 200433

朱吉庆，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生 200433

随着中国经济国际竞争力的不断增强，中国不仅作为世界经济最具活力的地区而吸引来自世界各国的投资，也已成为新兴的备受瞩目的对外直接投资来源地，并伴随国家“走出去”战略的逐步实施，将在更高水平、更大范围和更深层次上参与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分工。在此背景下，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进行理论探索与实证分析，尤其是研究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内市场潜力巨大、处于经济转型期的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现状与特征，判定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所处的发展阶段及未来走势，不仅会丰富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关理论，而且对于增强中国经济国际竞争力、提升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大国地位以及加快融入世界经济进程也有着不可估量的

实践价值。

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探索

以海默的垄断优势理论、巴克利等人的内部化理论以及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范式等为代表的对外直接投资主流理论，是以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为对象展开理论分析的，暗含着“本国企业具备一种或几种相对于它国企业更加有利的优势时，才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这一基本命题。然而，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起步晚，规模小，技术含量低，大多数跨国公司并不具备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某种优势。因而，主流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解释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行为乏力。

代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综述与研究

刘 清 王永县 郑胜利

内容提要 本文将新兴工业国家或地区及其外包生产企业作为独立的对外直接投资主体进行研究,提出代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动因研究问题。理论综述发现,现有主要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体系中缺乏外包生产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专门理论或学说。通过对现有理论的缺陷分析,进一步提出了研究这个问题的基本假设和分析框架。

关键词 外包生产 代工企业 对外直接投资

刘 清,清华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系博士研究生 100871

王永县,清华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系教授 100871

郑胜利,清华大学台湾研究所博士后 100084

外包生产,也称贴牌生产,在中国台湾通俗名称是代工生产,其基本含义是:按品牌单位委托合同,用自己的设备进行产品开发和制造,用品牌单位商标销售或经营的合作生产经营方式。20世纪80年代开始,台湾主导产业转入以电子信息等高科技产业为主的阶段,国际代工成为台湾产业的主要模式,台湾也成为国际外包企业发展最成功的新兴工业地区之一。

台湾对大陆的投资是两岸经贸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代工企业在其中占有突出位置。根据商务部统计,台湾是继香港和美国之后大陆外资的第三大来源地。据台湾统计资料,2003年,台湾在大陆投资的投资占其对外总投资的66%。大

陆台资企业大致可以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中小型最终产品制造企业即品牌企业,它们基于两地市场而到大陆进行直接投资;第二部分是以代工为主高科技企业、化工和机械等中间产品加工为主的大中小型企业的直接投资。

在更大视角下观察,外包生产形式正在成为国际分工的重要载体和跨国公司国际生产的主导模式之一。20世纪80年代以来,跨国公司将越来越多的价值链活动离岸外包给生产商,积极拓展外包网络。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外包生产由发达国家之间扩展到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由传统的服装、鞋类、玩具等轻型制造业扩展到家用电器、运输设备制造等重型产业,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台湾产业集群演进过程中的国际代工现象研究”(批准号2005CGZ003)及2006年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

国际视角下的中国经济转型： 模式、机制与展望

单豪杰

内容提要 本文在基于已有文献和国际经济转型的实践重新梳理了“二分法”经济转型模式的理论脉络，在这个分析框架下介绍和评述了当前国际转型经济学界对经济转型模式的论争；并根据现有的经济发展理论和中国的事实在特征严密地推敲出了在逻辑上依次递进而又相互支撑的经济转型的演进机制；最后在审视中国经济转型现实的基础上，提出了建立“以法治建设为先导、政治文明为目标的市场经济”是我们走向一个好的市场经济的必然选择。

关键词 经济转型 华盛顿共识 渐进式模式

单豪杰，南京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210093

在当今世界，大约有 30 个国家处于经济转型之中，转型的过程影响着大约 17 亿人的生活，除了中国和俄罗斯之外，还有东北欧区域的 8 个国家以及曾同中国经济体制相类似的越南、古巴等国家。经济转型的全面转变给人们带了根本性的变化，它应该是当代最重要的事件之一。按照著名经济学家科尔奈的观点，转型应该具有广泛的内涵。它应该包括许多方面，甚至是一些较小的转型，转型不仅包括经济转型，还包括生活方式、文化的转型，以及政治、法律制度的转型等多个层面。同时考察转型应该用多维度进行考察，而经济转型是一个重要的考察维度。而本文所要考察的主要是经济方面的转型。所谓经济转型一般是指从传统的社会主义下以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为配置资源的主要方式转向以市场为主要

配置资源的市场经济的过渡。

一、“二分法”的经济转型模式

在对原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一般把经济转型的模式划分为激进式和渐进式两种：前者也是华盛顿共识所倡导的，即采用“休克疗法”或“大爆炸”的方法迅速实现私有化和价格的自由化，这种方式主要以俄罗斯联邦为代表；后者是被经济学界推崇为渐进主义的模式，采取逐步的方式向市场经济转型，这种方式以中国的经济转型为代表。这种“二分法”的经济转型模式，从表面来看，是从转型的速度上来进行划分的，但其背后却有很强的经济理论基础。激进式模式的理论基础就是曾经风靡全球的“华盛顿共识”，而渐进式模式的理论基础

此项研究得到南京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基金(2006CW01)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70473036)的资助

利益集团与制度变迁

——对转型之谜的一个解析

孙景宇

内容提要 本文从经济行为与经济制度的互动中来研究中国和前苏东国家的经济转型,从而解释为什么有着相似的起点和相近的目标的制度变迁会在它们之间表现如此不同。研究认为,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能否限制“狭隘利益”集团的掠夺之手,并进而使其成为援助之手的关键在于第一行动集团是否具有“共容利益”。只有能够代表大多数人民利益的集团充当第一行动集团,才能确保经济转型的结果不违背其初衷。

关键词 利益集团 制度变迁 转型方式 转型绩效

孙景宇,南开大学经济学院讲师 300071

一、引言

从传统的以国有制为基础的中央计划经济转变为基于多元产权制度的市场经济体制是传统计划经济国家在20世纪后期所面临的共同任务。然而相似的转型任务却在中国和前苏东国家产生了截然不同的后果。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与前苏东国家的经济出现全面衰退以至近乎崩溃相比,中国不但从未出现过负增长,反而一跃成为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和最具活力的国家和地区之一,创造了“中国奇迹”(樊纲,1993;林毅夫、蔡昉、李周,1994;斯蒂格里斯,2000;科勒德克,2000;博戈莫洛夫,2004)。那么,为什么有着相似的起点和相近的目标的制度变迁过程会

表现如此不同?这成为一个转型之谜,吸引了众多经济学家的目光。

最初经济学家(樊纲,1993;刘世锦,1993;盛洪,1994)认为造成转型之谜的原因在于中国和前苏东国家选择了不同的转型方式。他们认为,与前苏东国家的经济转型采取“休克疗法”,从根本上彻底颠覆传统经济体制相区别的是,中国的经济转型采取的是渐进式的方式,从对传统经济体制的调整开始逐渐实现体制转变的。而通过对转型成本的分析,他们认为与激进式转型相比,渐进式转型是一个使较少人受到损害的方案,这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转型成本,使转型过程表现为一个“帕累托改进”过程。但是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经济学家日益认识到转型路径和结果的多

M-F 模型:理论发展及其对中国的政策启发

陈志龙 黄余送

内容提要 M-F 模型是研究开放经济条件下政府政策搭配的出发点。本文从大国经济角度出发,分析在不同的汇率政策下政府的最佳政策选择。作者认为,中国正在向大国经济转型,在资本流动受到管制,货币政策效果不显著的情况下,低估的汇率政策和扩张性财政政策搭配更加适合中国经济发展。

关键词 开放经济 M-F 模型 大国经济 财政货币政策 政策组合

陈志龙,南京农业大学经管院博士研究生 210095

黄余送,南京大学商学院金融学系博士研究生 210093

一、引言

M-F 模型是研究开放经济最重要的工具之一,它建立在以下严格的假定之上:(1)开放的小国经济。其国内经济变化和政策变化对世界其他国家不会产生影响,但世界市场的价格变化对该国经济有影响,小国是世界市场价格(包括资本品)的接受者。(2)资源未得到充分利用,经济体的价格向下具有刚性,向上具有弹性。(3)资本在各国之间自由流动。(4)商品市场和货币市场在短期内均能实现均衡。(5)静态汇率预期。资本在国际之间流动只受利率差异影响,汇率预期不会改变。基于这些假定,M-F 模型分析了经济由不均衡向均衡调整的动态过程,得出开放经济中财政政策在固定汇率制度下有效,而货币政策在浮动汇率制度中有效

的结论。由于该模型的结论应用性很强,成为许多国家制定经济政策的指导原则。

但是,现实与理论有很大不同。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一些具有前瞻性的投机商首先通过媒体改变市场对东南亚等小国货币汇率的预期,进而在外汇市场不断冲击这些国家货币的稳定性,虽然被冲击国家按照 M-F 模型指导思想大幅度提高利率,力图捍卫本币对外价值的稳定性,但是被冲击小国无不在付出惨重代价以后被迫改变汇率制度,货币对外价值任由市场决定。而中国(香港和大陆)虽然也遭到投机冲击,但是货币价值依然保持稳定。这表明经济规模已经成为影响市场运行的重要因素。

此外,按照 M-F 模型,一国外部经济不可能长期偏离均衡水平,否则在浮动汇率制度下汇率将自动调整。但是日本经济持续出现巨额顺差,

论国企产权改革的控制权核心

——南京国民政府民营化改革失败的制度经济学启示

周末 杨德才

内容提要 上世纪 40 年代,南京国民政府曾主导了一次鲜为人知的国营企业“民营化”运动。但由于多种原因,国民政府的民营化改革以彻底失败而告终。本文通过对这次“民营化”过程中暴露出来的制度经济学问题进行分析,阐述控制权在企业产权制度中的核心作用。

关键词 南京国民政府 国营企业 民营化改革 控制权 人力资本

周末,南京大学商学院研究生 210093

杨德才,南京大学商学院教授 210093

在上世纪 40 年代,国民政府曾经推动过一次大规模的国营企业民营化改革运动,以缓解国家财政危机,根治长久以来国营企业中贪污腐败成风和经营效率低下的问题。最早的民营化政策建议在 1937 年抗战爆发之前就被国民政府高层提出,并在抗战后逐步推行,历经四届内阁。每届内阁都积极推进民营化,拿出了相当一部分优质的国营资产,制定了详细的民营计划,但是最终却以彻底失败告终,所有出售资产以金圆券计值仅 3774 万元,不到所有待售资产的 5%。检索其失败的原因,南京国民政府在军事战场上的失利和当时金融政治的混乱是一个重要方面。而另一方面,民营化过程中对控制权转移的处理失当,导致社会矛盾加剧、国有资产流失、企业组织动荡等问题在今天依然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

一、控制权理论及其“控制权”分析的基础

控制权从来是产权的一个重要方面,道格拉斯·诺斯指出:“产权关系到一个行动者使用和控制有价值资源的权力,这些权力被社会的其他成员承认和实施。”^[1]张五常将控制权和使用权分开,他认为控制权是构成产权的基本要素^[2]。Grossman 和 O.Hart 是最早界定“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的学者。对于“剩余控制权”,O.Hart 和 J.Moore 将其定义为:“决定资产最初契约所限定的特殊用途以外如何被使用的权利。”^[3]这里,“特殊用途”被认为是企业所有者投资目的的体现。与此相关,周其仁在《产权与制度变迁——中国改革的经验研究》一书中,从另一个角度对“控制权”概念给予了诠释,即:控制权是“排他性利用企业资产,特别是利用企业资产从事投资和市

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客观标准

杨思明

内容提要 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一直是个热点问题。近年来,全国许多地方陆续对国有中小型企甚至大型企业进行了以产权结构多元化为主要内容的改革。企业改革后,如何衡量改革是否成功,需要提出验证的标准。本文从是否符合改革目标、是否符合政策要求、是否损害改革主体这三个方面提出了十条检验标准。如果国有企业改革后,达到了这十条标准,就可以初步认定改革已基本取得了成功。

关键词 国有企业 产权制度改革 标准

杨思明,南京大学国际商学院博士研究生 210093

近几年来,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改革进入了一个高峰期。绝大多数中小型国有企业在地方政府的主导之下,通过管理层收购、职工持股、资产转让等形式实现了产权制度的变革。一部分大型国有企业,通过整体上市或吸纳外部资本参股,改变了国有股“一股独大”的状况,实现了产权结构的多元化。还有一部分国有企业通过重组联合,在把企业蛋糕做大的同时,实现产权结构的多元化。那么什么样的改革才是成功的改革呢?这就必须有一个客观的标准,以便对国有企业改革是否成功进行衡量。

一、国有企业产权改革衡量标准的原则

这个原则应该包括哪些内容呢?经过深入的研究。笔者认为应该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符合改革的目标的要求。因为国有企业的改革,其目

标就是通过产权制度的改革,转变经营机制,使企业充满生机与活力,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企业又好又快的发展,这也是科学发展观的体现。产权制度改革的标准必须体现搞好企业的要求。二是符合政府改革政策的要求。产权制度的改革政策性强,必须按政策规定一丝不苟地去操作,保证国有资产不流失,只有这样的改革才能经得住历史的检验、人民的检验、事实的检验。否则,就站不住脚,即使现在改了,明天也可能会被推翻重来,使企业遭受不应有的损失。三是不损害改革各个主体根本利益的要求。改革的结果是通过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提高企业的效益与竞争优势,从而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物质财富的增加,应该使涉及到的主体的利益都有所增加,而不应该损害其中哪一个利益主体的利益。只有这样的改革,才能取得各个方面支持,改革才容易取

现代社会中的理性与公共理性

史云贵

内容提要 理性是社会行为主体对客体的一种能动的反映,它是人们认识自然和社会及其规律的一种基本能力。社会行为主体的理性在许多情况下,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工具理性,它是一种不完全理性,或称有限理性。人们在对理性反思的过程中,往往从“理性至上”滑向否定和抛弃理性的极端。现代公共理性应该成为沟通和统一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个人理性与国家理性、大众理性与精英理性的中介和桥梁,它是横跨国家(政府)、政党、利益集团和个人之间,并以成熟自律的公民社会为基础的利益整合的能力和机制。以公民社会为底蕴与后盾,现代公共领域的培育和公共理性的提升对我国政治现代化无疑有着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 理性 公共理性 公共领域 政治现代化

史云贵,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610064

从古典哲学开始,人们就一直尝试着对什么是理性和理性的功能与价值进行探索。但长期以来,人们对于理性的概念、如何认识与利用理性本身的体认也常常是不理性的。尽管学术界长期以来非常注重理性和理性主义的研究,但人们却忽略了现代社会各种行为主体所必须具备的公共理性,甚至在公共理性的概念等方面还没有达成共识。本文从理性的概念和起源入手,提出了公共理性的概念和理论,探讨了现代公共领域与现代公共理性的关系,并以此为基础论述现代公共理性的培育和提升对我国政治现代化的重大意义。

一、理性、工具理性、价值理性

理性既是一个哲学概念,同时也是一个历史的、文化的概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在不同的文

化视域下,理性有着不同的内涵和外延。从纵向来看,一个历史时期被认为是理性的东西,在另一个历史时期就可能被认为是非理性的东西;从横向来看,一种文化所认可的理性,在另一种文化中有可能被认为是非理性的东西。

理性作为人类的一种固有的基本能力是为人们所普遍承认的。林毓生先生就认为,“理性(reason)是人生而具有的一种能力,一种发现什么是真理的能力,这个能力就是理性”;换句话说“‘理性’是一种使我们了解真理的本领。”^[1]“工具理性”(instrument reason)是用理性的办法来看什么工具最有效,以便达到我们的目的,易言之,考虑并采用最有效的手段以达到一个目的是“工具理性”。国家、政党、政府、利益集团等社会行为主体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作为工具理性存在的。人类

供给与需求：关于乡镇政府未来去向的分析

章荣君

内容提要 从供给与需求两个方面来看,由于乡镇政府“经济人”特性的张扬导致国家政权内卷化,因此乡村社会面临着治理危机。乡镇治理要顺应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新变化,将国家承担的部分职能转让给社会,让社会自主治理,逐步取消乡镇政府,并通过制度供给控制乡村社会,实现乡镇的有限自治,无论从供给还是从需求上来说都能化解乡镇治理危机,这才是合乎理性的路径选择。

关键词 供给与需求 乡镇政府 国家 社会

章荣君,南京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公共管理系讲师 210094

一、乡镇政府“经济人”特性的张扬导致国家政权的内卷化

内卷化的概念最初来自美国人类学家戈登威泽(Alexander Goldenweiser),他用这个概念来描述一类文化模式,即当达到了某种最终的形态以后,既没有办法稳定下来,也没有办法使自己转变到新的形态,取而代之的是不断地在内部变得更加复杂。格尔茨(Clifford Geertz)在其撰写的《农业的内卷化》(Agricultural Involution)中再次使用内卷化这一概念,藉以描述印尼爪哇地区一种生态稳定性、内向性、人口快速增长、高密度的耕作过程;资本密集和劳动密集的二重经济的复杂性和整合性,但又是缺少有效技术方法和工业因子引入的传统农业经济。爪哇社会具有高度的弹性和松软的不确定性,这种社会允许调整、吸收、采纳,但不支持真正的变迁。这种韧性的后哥

特式(late Gothic)农业的基本模式,由于内部的不断精致化,使每一个人和每一个细节被安排得十分精细和复杂^[1]。杜赞奇(Prasenjit Duara)用国家内卷化(state involution)描述了民国前期国家权力向地方社会的扩张,其所造成的两个影响便是税收增加和乡村政治制度架构的改变。内卷的含义是国家—社会关系的继传模式之复制、延伸和精致化。他特别指出,地方精英参与的乡村政权内卷化造成了一种恶性循环:国家税捐的增加引起盈利型经纪的增生;他们的增生反过来要求更多的税捐。于是国民政府在20、30年代不得不掀起打倒土豪的运动^[2]。

内卷化概念的运用经历了从最初的文化领域到经济领域再到政治分析领域这样一个过程。我们在这里要运用国家政权内卷化这一概念来分析乡镇政府。由于乡镇政府在执行公共政策时总是按照有利于自身经济人的特性来异化政策

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内在矛盾与 转型社会政治发展的图式转换

许和隆

内容提要 在西方政治发展理论中,西方中心主义的理论渊源及其特有的价值判断与主张价值祛除的行为主义方法之间存在着持久不断的矛盾与冲突。这种矛盾不仅导致了政治发展研究的衰落,而且也制约了这种理论研究在现实政治发展中的作用。政治发展不仅是人类挥之不去的永恒主题,而且政治发展本身也不可能排除价值追求,但是这种价值只能是人类社会在不同发展时期对人类本性的回应与满足,于是政治发展及其研究的图式转换就成为必然。

关键词 政治发展理论 矛盾 路径 转换

许和隆,广东省韶关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系副教授 512005

一、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基本内涵与主要研究内容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酝酿发育,到70年代中期以后陷入低迷的西方政治发展研究不仅成就了如亨廷顿、阿尔蒙德、派伊、李普塞特、艾森斯塔特、卡特莱特、布莱克等等身名显赫的政治学家,同时也因为特殊的历史环境及其研究对象的复杂性、研究方法的差异性、分析角度的不同等等而异彩纷呈。阿尔蒙德认为政治发展就是政治文化的世俗化,政治结构的分化以及政治决策能力和贯彻政策能力的提高^[1]。按照亨廷顿的论述,当时的研究者多从四个方面对政治发展加以定义,即地理的,被界定为亚非拉较穷国家或工业化较差国家的政治变迁;派生的,被认为是

指更为广阔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方面和后果;目的的,被界定为朝着一个或更多目标的运动,如政治稳定、政治民主、政治参与等等;功能的,被看作是朝着现代工业社会所特有的政治的一种运动^[2]。派伊把不同学者对政治发展内涵的理解归纳为十个方面,并认为政治发展具有三个核心趋向:一是与政治系统相关的个人的持续增长的平等,如广泛的民主参与,政治生活的法治化,公共职位的平等获取等;二是与环境相关的政治系统的能力不断提高,即政治系统在经济社会发展日益复杂的条件下,在政治和行政决策、管理方面更加科学、高效;三是政治系统内部体制和结构的日益明细的分化,这种分化意味着政治组织既实行高度专门化的分工,又能相互合作、相互制约、相互协调,有序运行^[3]。这些虽然基本概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04&DZ006)子课题“文化体制改革政治学视角的分析”部分成果

论江泽民对人的全面发展学说的新发展

米如群

内容提要 人的全面发展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内容。江泽民对社会主义和人的全面发展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精辟而深刻的论述，继承、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学说，形成了一个科学完整的思想体系。江泽民对人的全面发展学说的新发展主要集中体现在十个方面：人的全面发展本质论、人的全面发展标准论、人的全面发展过程论、人的全面发展动力论、人的全面发展基础论、人的全面发展内涵论、人的全面发展途径论、人的全面发展主体论、人的全面发展教育论、人的全面发展战略论。

关键词 江泽民 全面发展学说 发展

米如群，江苏技术师范学院党委书记 213001

人的全面发展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内容，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占有核心地位，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今时代最富有生机的生长点。我们党的领导集体核心对人的全面发展问题非常重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作过具有重大指导意义的论述。尤其是在新的历史时期，针对新的形势和任务，江泽民对社会主义和人的全面发展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精辟而深刻的论述，继承、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学说，开拓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关于社会主义和人的全面发展论述的新境界，为全面推进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教育改革指明了正确方向。江泽民对人的全面发展学说的新发展主要集中体现在以下十个方面：

一、人的全面发展本质论

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社会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内在要求和实现基础。长期以来，对人的全面发展的本质，学术界、理论界有各种各样的理解。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认为，生产劳动是人类社会存在的基础，因而他们把人的全面发展首先看成是人的劳动能力的发展。江泽民同志在“七一”讲话^[1]中对社会主义和人的全面发展问题作了极其深刻的论述，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是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而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我们“必须把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归宿，……使人民群众不断获得切实的经济、政治、文化利益。”“把握住这一点，就从根本上把握

民法与市民社会关系述要

公丕祥

内容提要 民法与市民社会的关系,是近些年来我国法学界研讨的论题之一。本文从民法的属性、民法的发展、民法的结构诸方面,深刻揭示了民法与市民社会之间的内在关联,指出市民社会是民法存在的基础,而民法则是市民社会的法律表现;市民社会的发展变化催生了民法制度的成长与丰富,而民法的发展又反过来影响市民社会的历史进程;市民社会的法律要求凝结为权利主体制度、所有权制度和契约制度,而这三大制度决定了民法典的基本结构。

关键词 民法 市民社会 商品经济

公丕祥,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 210097

近些年来,我国法学界逐渐对民法与市民社会的关系产生了兴趣,愈来愈多的学者把民法制度看成是市民社会运动的历史产物,而且展开了多方面的论证。这的确是一种很有意义的法学现象。本文拟对民法与市民社会的相互关系作一简要的初步探讨。

一、市民社会的概念与民法的属性

什么是市民社会?在这个问题上,学者们的看法是迥然相异的。马克思指出:“‘市民社会’这一用语是在18世纪产生的,当时财产关系已经摆脱了古代的和中世纪的共同体。真正的资产阶级社会只是同资产阶级发展起来的。”^[1]市民社会这一用语或名称“始终标志着直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这种社会组织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的基础以及任何其他的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基础。”^[2]很显然,马克思所理解的“市民社

会”概念与社会的经济基础是同一个属性的概念,也称之为“交往形式”。所以,马克思说:“在过去一切历史阶段上受生产力制约、同时也制约生产力的交往形式,就是市民社会。”^[3]“市民社会包括各个个人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一切物质交往。它包括该阶段上的整个商业生活和工业生活”^[4]。

在这里,市民社会与商品经济具有内在的密切关联。与自然经济不同,商品经济是一种以获取物的交换价值为目的的经济形态。在商品经济居于主导地位的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表现为以物的关系为媒介的人的互相依赖。彼此独立的、毫不相干的个人,借助于交换价值的中介而构成他们之间的社会联系,人与人之间的平权关系得以建立和发展起来,各个个人独立自由地互相接触与互相交换。诚然,商品经济发展程度的历史差异性,决定了商品经济所主导的社会

市场经济与经济社会中的正当性

沈敏荣

内容提要 市场经济不单纯是经济制度,作为近现代社会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它隐含着强烈的社会“正当性”的内涵。它是为了克服近代民族国家产生以来个人与国家和政治社会存在的紧张关系和潜在的分裂,而建立起来的个人与社会共同发展的现代社会的理念。市场经济及在此之上建立的经济社会的内涵决定了以人的品格为取向的法治社会的建立。

关键词 市场经济 经济社会 民族国家 城邦国家

沈敏荣,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100070

中国对市场经济的理解,从完全否定市场经济,到将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思想相结合,经历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在这个过程中,市场经济仍是完全作为经济层面的问题来进行考虑。其实,市场经济首先是一个社会思想,然后才是一个经济结构。中国经济法制面临着诸多困难,如基本法律的难产、法律制度的矛盾、法律与潜规则的交织、执法与行政的混淆、现代与传统的分离,在对市场经济认识不足的状况下得到了加强。因此,厘清市场经济的思想对于了解和深化我国的社会结构,建立合理的经济法制,甚至是整体法律制度的完善都是相当有益的。

正当性是一个价值判断的问题。在近现代意义上,社会的基本要求是社会的发展与个人的发展应当是并行不悖的,而且,个人的发展是社会

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与这一要求相符合的就是正当的,而与之相违背的,就是不正当的。市场经济是在这一思想基础上产生的,正当性也是建立在这一判断基础之上的。

一、市场经济思想产生的背景:近代国家正当性的消失——国家的“利维坦化”(异化)

近代国家的标志是民族国家的产生,它区别于原来古希腊罗马意义上的城邦国家。城邦国家是建立在全民(公民)的直接民主基础上的:公民参与政治生活,在政治生活中得到发展。这在古希腊雅典的伯里克利的思想中得到强烈地体现:“……惟独我们雅典人才认为,不参与国事的人乃平庸之辈,而不只是懒汉。我们能做出最准确的判断,并且善于抓住事物的本质。我们不认为

本研究受北京市优秀人才资助项目“中国竞争法的完善与经济社会研究”(20061D0501900272)及北京市教委项目“从‘分立’走向‘和谐’:法学教育中的德育——由传统德育向新型德育的转化”(2007XJ029)的资助。

政治基础与民法取向

章礼强 汪文珍

内容提要 得益于国家主义的整合作用,新中国获得了较为统一的国家形态,但国家主义也给中国的发展带来诸多不利影响。市场经济文明运动,使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城邦之间的关系更多地成为理性化的契约关系。这种契约关系,一方面以个人自主平权为前提,另一方面又促进了个人主体意识的增长。不论公法、私法还是社会法,依法治国的根本目的是对公权力的限制和对私权利的保障。在实现这个目标的过程中,对私权利的最大损害来源于公权力的滥用。因此,在我国当前依法治国环境下,应当大力弘扬民法平等、自由的契约精神,坚持民法的市民权本位即私主体或民事主体权利本位。

关键词 民法 政治基础 国家主义 法治国家 契约关系 市民权本位

章礼强,东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200051

汪文珍,东华大学讲师 200051

民法属于上层建筑且为统治者所制定和认可,因而民法与政治有一定的关系,研究民法本位及其价值取向应当考察其政治基础。

一、中国国家主义缘起与弊端

考察中国政治与法的关系的发展过程,可以清楚地看到国家主义观念对于法与政治关系的影响。中国政治法律文化中国国家主义特点的形成与中国独特的地理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中华文明发源于黄土高原上的黄河流域。黄河的壅塞与

泛滥客观上需要有一个中央集权的政权,能够有威望动员所有的资源,也能指挥有关的民众,在黄河的威胁之下,给予社会发展应有的安全。季风所携带的水分由东向西在沿途变为降水,经过中原地区进入西北之后已成强弩之末,降水骤减。由此造成了游牧文明与农业文明的分野。而游牧民族与中原农业地区的冲突,则成为贯穿中国历史的一条主线。在气候不利、牧草稀疏、牲畜大量死亡的年份,游牧民族不由自主地要南下侵掠。这样的侵略极易得手,因为农业生产收获是

本文是国家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课题《民法哲学研究》(批准号为03JD820010)成果之一。课题负责人是章礼强。

论英人据港时期香港地区报刊 立法活动的四次转折及内在原因

倪延年

内容提要 在英人占据香港的 150 多年间,香港地区报刊法制发展的历程中出现了四次转折。本文介绍了这些转折的背景和内容,并分析了内在的原因。

关键词 中国新闻事业史 报刊法制发展史 中国香港地区

倪延年,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210096

香港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1842 年 8 月 29 日英国政府逼迫清政府签订的中英《江宁条约》规定:中国向英国赔款二千一百万银元;割让香港;开放广州、上海等五处为通商口岸;中国抽收进出口货的税率由中英共同议定,不得随时变更^[1]。直到中国政府于 1997 年 7 月 1 日恢复行使主权前,香港一直由英国殖民当局管理。回顾英人据港 150 年左右时间里报刊法制的发展历程,大致经历了四次比较明显的转折。

一、从沿用中国法律向依照英国法系立法的转折

从 18 世纪末期起,英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就向中国大量输入鸦片,毒化中国人民,导致中国银价飞涨,财政困难。1838 年底,民族英雄林则徐受命赴广东查禁鸦片。次年 6 月先后在虎门销毁了缴获的鸦片 2 万多箱 115 余万斤。英国政府即于 1840 年 2 月决定向中国派遣“东方远征

军”,发动罪恶的鸦片战争。英军舰队于 1841 年 1 月 26 日强行登上中国领土香港岛。1842 年英军继续扩大战争,军舰大炮直逼南京城下,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中英《江宁条约》,从此香港成为英国的殖民地。

在英国人占领香港之前,中国政府一直对香港行使主权。历代政府制定颁布实施的所有法律包括出版及规范社会报刊活动等方面法律,同样在香港具有法律效力。如在清乾隆五年颁行的《大清律例》及后来光绪朝颁行的《大清律例增修统纂集成》中就有诸如“凡造讒纬妖书妖言,及传用惑众者,皆斩”;“各省抄房,在京探听事件,捏造言语,录报各处者,系官革职,军官杖一百,流三千里。该管官不行查出者,交与该部,按次数分别议处”^[2] 等具有法律效力的条款。英人在据港后的《义律公告》中曾明确宣布“在未获女皇陛下进一步指示之前,香港岛上的原居民,以及所有

本文是国家教育部 2005 年度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我国香港澳门台湾地区报刊法制发展史研究”(项目编号:05JA860006)的系列研究成果之一

转型阶段的经济利益矛盾与和谐社会建设

刘根荣 洪银兴

内容提要 我国各种经济利益矛盾,是由市场失灵、政府失灵以及市场制度缺失所造成的。但归根结底,各种经济利益矛盾基本上可以归结为政府职能的问题。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是个长期的过程,其内容就是构建经济转型期的和谐社会。针对当前各种社会经济利益矛盾产生的根源,我们应该从三个方面着手推进转型阶段的和谐社会建设:一是要正确认识和谐社会与改革稳定的关系;二是要选择合适的经济利益调控模式;三是要着力构建和谐社会的制度基础。

关键词 转型时期 经济利益矛盾 成因 治理

刘根荣,南京大学长江三角洲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理论经济学博士后 210093

洪银兴,南京大学长江三角洲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教授 210093

一、转型阶段经济利益矛盾的根源

经济利益冲突的本质是各社会主体对社会财富及其权利的争夺。从表面来看,现阶段各种经济利益矛盾产生的原因非常复杂。从一般意义上讲,可以把这些原因归结为两点:一是市场失灵而产生的经济利益矛盾;二是政府失灵产生的经济利益矛盾。但从转型时期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除了两大失灵领域会造成各种经济利益冲突外,转型社会所特有的制度性缺陷会加剧各种社会经济利益矛盾。

1、市场机制本身具有产生各种经济利益矛盾的天然属性

首先,从资源配置的角度来看,市场无法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与垄断问题。市场经济要求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的过程中起基础性作用,将生产要素配置在最有效率的地方。但市场机制在配置资源的过程中会有失灵的时候,其突出表现就是信息不对称和垄断。微观经济学中的“道德风险问题”与“逆向选择问题”就是信息不对称情况下,引发的交易双方的经济利益冲突。现在消费者与生产厂商之间的矛盾,订立合约的厂商之间的矛盾,以及其他一切有契约关系的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往往是信息不对称诱发的问题。而市场本身不可能解决这类问题。市场机制强调竞争的作用,而竞争的后果又会带来著名的“马歇尔

关于和谐社会建设的社会学思考

刘国富 李汉林

内容提要 和谐的社会自然是一个稳定的、有秩序的社会。社会的稳定是我们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一个社会的不平等和不公正并不是直接影响这个社会的稳定的，只有在一些特定条件下逐步递进并不断强化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导致一个社会的不稳定；我们认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就是社会中生活在各种不同组织中成员的和谐，当我们比较清楚地了解了造成一个组织团结的机制、条件和过程的时候，我们就向和谐迈进了一大步。

关键词 和谐社会 社会稳定 组织团结 劳资关系

刘国富，上海大学文学院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 200436

李汉林，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社会学系教授 100732

一、社会稳定与和谐社会建设

一般而论，和谐的社会是一个稳定的、有秩序的社会。社会的稳定是我们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

在社会变迁的意义上，中国的发展，首先是通过引入市场机制，造成原来社会的结构与功能失调以后，经过逐步的调整，从而达到新的协调，实现发展的突破与超越。所谓中国的道路与经验，也都是在试图归纳与说明，中国如何在保持社会相对稳定的过程中实现发展的突破与超越。一个充满冲突的社会，只会导致动乱与停滞，而不可能造成和谐与发展。那么，在社会变迁与转型过程中，有哪些因素会影响一个社会的稳定呢？

大量社会学的研究表明，当一个社会的不平等、不公平和不公正超过大众所能承受的限度的

时候，就会在很大的程度上影响这个社会的稳定^[1]。我们知道，任何一个社会不可能有绝对的平等、公平和公正。没有差异，就不可能有发展；不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就不可能最终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一个政府是否有可能通过相应的制度安排，在不平等造成贫富差距过大的时候，努力缩小贫富的差距；当社会的不公平和不公正导致利益分配机制严重失衡的时候，努力调整她的利益分配政策。

从社会学理论上说，一个社会的不平等和不公正并不是直接影响这个社会的稳定的。只有在以下三种条件下逐步递进并不断强化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导致一个社会的不稳定^[2]。这三个条件简单地说就是：1.人们的相对剥夺感、地位的不一致性和不满意度变得愈来愈高；2.社会的基本价值取向和行为规范发生动摇和混乱；3.政府不作为。具体地说，不平等和不公正首先造成的一个最明

都市化进程中的“新农村”建设与“城市群”发展

刘士林

内容提要 “新农村”与“城市群”是“十一五”规划中的两个关键词，也是都市化进程在当代中国的具体体现。面对“城市群”与“新农村”，我们既要看到两者的矛盾，也要看到它们的相互依存关系。由于都市化进程在加剧农村与城市在人口迁移、资源分配、文化消费等固有矛盾的同时，也为它们在更高的历史平面上综合解决城乡之间的紧张与危机关系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与先进的实践框架。因此如何处理好“新农村”与“城市群”的关系，认真地研究两者的内在关系原理与外在实践框架，就显得十分重要了。

关键词 新农村 城市群 都市化进程 科学发展

刘士林，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 200234

一、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两个关键词

在《中央关于制定十一五规划的建议》中，有两个关键词值得放在一起思考与研究：一个是“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新农村建设，一个是首次提出的作为国家综合竞争力最高象征的“城市群”概念。在“十一五规划”的文本中，它们代表着两种不同的政治关切态度与未来发展方向，前者是“坚持‘多予少取放活’，加大各级政府对农业和农村增加投入的力度……通过农民辛勤劳动和国家政策扶持，明显改善广大农村的生产生活条件和整体面貌”；而后的主旨在于，“以特大城市和大城市

为龙头，通过统筹规划，形成若干用地少、就业多、要素集聚能力强、人口合理分布的新城市群”，并明确要求已形成一定规模的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环渤海地区，“继续发挥对内地经济发展的带动和辐射作用，加强区内城市的分工协作和优势互补，增强城市群的整体竞争力”。关于建设新农村，是比较容易理解的，而“城市群”则是一个新概念与新生事物，不仅理论研究相当不足，学术界的反应与态度也相差很大，因而在那里需要做必要的界定、阐释与梳理。

“城市群”在国际学术界通常被称作“都市群”，也有“都市带”、“大都市圈”、“大都市联绵区”等别称。它在词源上来自希腊语“Megalopo-

论文艺的“和谐”理想与功能方式

柯 玲 陆建华

内容提要 构建和谐社会,文艺担负着特殊的使命。和谐是人类的生活理想、社会理想,更是审美理想。和谐是文艺的追求目标,和谐也是文艺的功能方式。无论是温和滋润方式,还是诙谐幽默方式,抑或金刚怒目的方式从本质上说都是一种和谐方式。

关键词 和谐社会 文艺和谐 理想境界 和谐关系

柯 玲,东华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副教授 200051

陆建华,江苏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210029

自 2004 年起,党在十六届四中全会、五中全会、六中全会上连续开展关于和谐社会的讨论,使“和谐”成为全社会关注的问题,人们把构建和谐社会作为明确的努力目标。同时,不同领域对于构建“和谐”的大讨论相继展开并不断深入。在文艺界,关于文艺与和谐社会的关系,文艺在和谐社会中的角色和作用等话题纷纷成为讨论的热点。这些讨论为深入研究“文艺和谐”开了个好头,也对笔者的思考产生了很大的启发作用。何西来说:“和谐,是指事物关系的一种平衡、有序、且相对稳定的存在状态和发展状态。”^[1]笔者觉得,“和谐”在日常生活、社会活动、文艺活动等不同领域内有着不同的涵义。到目前为止,文艺活动的对象——社会生活大多还是不和谐的。文艺和谐既是文艺系统内部诸要素之间关系的反映,也是作为审美意识形态的文学艺术活动和其它意识形态以及社会生活之间的良性关系的概括,而这些都作为一

种理想召唤着文艺工作者积极努力为实现和谐目标而不断探索和追求。所以,在文艺活动中,和谐显著地表现为一种理想的美学境界,表现为文艺各种特别的社会功能方式。

作为文艺活动唯一源泉的社会生活包括了两大部分,一为日常生活活动,一为社会活动。相应地,在文艺作品中形成了以反映日常生活题材为主的普通叙事和反映重要社会活动内容的宏大叙事。文学艺术的和谐与社会生活的和谐之间关系极为密切。和谐一贯是民众生活的理想,是社会高度文明的标志,因而也是文艺执着的美学追求。和谐的生活是文艺和谐的基础,构建和谐社会是文艺应担负的历史使命,实现文艺自身以及文艺与其他社会意识形态之间的和谐则是文艺孜孜以求的美学和社会目标。

和谐是民众一贯的生活理想。和谐的核心是

论原生态诗性文化

徐放鸣 王光利

内容提要 文化的产生与发展是一个绵延的过程,从它伴随人类产生的原始状态与人的原始思维模式等诸方面分析,可以探知原生态和诗性是文化的基本审美特征,而最能体现这两大审美特征的是民间文化。劳动大众在自由状态下真纯不羁、天籁自鸣和率性而发的情与意的抒发,体现了民间文化的原生态特性;强烈的好奇心、丰富的想象力和崇高情感的原始诗性在历史长河中自然融入并积淀在各种民间文化形态之中。对原生态与诗性的阐释与发掘将对文化的发展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 原生态 诗性 审美特征 民间文化

徐放鸣,徐州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221116

王光利,徐州师范大学文艺学专业研究生 221116

时而青涩、时而嘹亮婉转的天籁之音,奔放冲决而又细腻纤巧的肢体动作,绮丽古雅的民族服饰,狂野而真诚的神情,著名舞蹈家杨丽萍领衔推出的大型原生态歌舞《云南映象》以它原始而又充满诗情画意的映像,不但征服了国内亿万观众的心,也以东方歌舞所特有的魅力征服了自恃具有文化主导权的西方观众,引发了西方人对中华民族文化特性的更多关注。《云南映象》的亮相,一方面唤起了现代文明人对原汁原味民间文化艺术形态的观照与共鸣,同时也在国内引发了一场席卷全国、积极展现各地原始民间文化的飓风。2006年夏季中央电视台青歌赛“原生态唱法”的首次设立,继而大型西藏歌舞《神奇的家园》与云南大型原生态民族乐舞《云岭天籁》的推

出与轰动,在证实原生文化形态具有无穷魅力的同时,也自然地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在全球化与现代化日益直接而深刻地影响我们的文化观念与文化生活的当下,为什么原汁原味的文化艺术形态能引起如此普遍而强烈的共鸣?因为积淀在其中的原生态与诗性特质是文化中蕴藉最深厚、审美特性最强烈的文化存在特性,民间文化是文化原生态与诗性审美特征最自然最丰富的承载者与体现者,它对于处于后现代消费社会,阅尽奢华精致的现代艺术的人们来说,具有神秘的、新奇的召唤作用,能够以其独特的地域和民族风情、朴野动人的生命活力构成特有的审美表现力,给现代人带来“陌生化”的艺术冲击力。由此引发我们思考在后现代文化背景下应该

两个罗贯中

陈 辽

内容提要 有两个罗贯中,一个是小说家罗贯中(约1280—约1360),山东东平人;一个是杂剧家罗贯中(约1323—约1397),山西太原人。他俩不仅籍贯不同,而且年龄差别很大,小说家罗贯中比杂剧家罗贯中大约年长四十几岁。《水浒》应为罗贯中、施耐庵合著。

关键词 小说家罗贯中 杂剧家罗贯中

陈 辽,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 210013

伟大小说家罗贯中的籍贯在哪?原有山东东原(即东平)、山西太原、江西庐陵、浙江杭州四种说法。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辨证,江西庐陵说、浙江杭州说已不再有人坚持。罗贯中籍贯东原说、太原说成了《三国演义》研究界双峰并峙的两种意见,谁也说服不了谁。2006年8月,我参加了在山东东平县举行的“罗贯中与《三国演义》《水浒传》国际学术研讨会”,阅读了“泰山名人研究室罗贯中课题组”的调查研究报告《关于罗贯中原籍“东平”说的研究和调查》以及其它有关资料,结合对罗贯中原籍“太原”说的论文和资料进行分析,经过长时间思考,方才发现,原来关于罗贯中籍贯研究的误区在于,把小说家罗贯中的籍贯资料和杂剧家罗贯中的籍贯资料混为一谈(按:过去我也曾进入过这一研究误区),于是相互抵牾,彼此矛盾,怎么也不能统一起来。如今我走出这一研究误区,另辟罗贯中籍贯的研究新思路,于是豁

然开朗,柳暗花明,终于解开了罗贯中籍贯之谜:一个是小说家罗贯中,山东东平人;一个是杂剧家罗贯中,山西太原人。他俩不仅籍贯不同,而且年龄差别很大,小说家罗贯中比杂剧家罗贯中大约年长四十几岁。下面,我据事实说话,说明我的罗贯中籍贯研究的新思路是符合两个罗贯中的实际的。

一、杂剧家罗贯中,其籍贯确为太原

说罗贯中的籍贯是山西太原人,虽然资料仅有一则,但这则资料是过硬的。这一资料见于《录鬼簿续编》(《续编》作者一说为贾仲明,一说为无名氏):“罗贯中,太原人,号湖海散人。与人寡合。乐府、隐语极为清新,与余为忘年交。遭时多故,各天一方。至正甲辰复会,别来又六十余年,竟不知其所终。”和罗贯中有“忘年交”的《录鬼簿续编》的作者,对罗贯中的籍贯是不会搞错的。古代人见面、相识后,第一件事就是了解对方的郡望。

论 古 代 集 句

俞樟华 方 梅

内容提要 集句是古代文学中一种特殊的表现形式,包括集句诗、集句文、集句词、集字和集句对联等,它产生于西晋傅咸,大盛于宋代,元明清各代皆有佳作。本文叙述了集句的产生、发展、流传,以及它的特点、成就,分析了集句的优劣,认为集句自有其独特的艺术魅力,不可以“游戏”视之。

关键词 古代 集句 特点

俞樟华,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321004
方 梅,浙江经济职业技术学院教师 310000

集句是古代文学发展中为求新变而出现的一种新的文学表现形式,虽有“以文为戏”或“形式主义”的弊病,但是在文学的实际发展中,集句却又有极强的生命力,不仅在集句最盛的宋代像王安石、苏轼、黄庭坚、杨万里、文天祥等大诗人都曾留有佳作,而且后世不绝如缕,代代文人均有创作,其中不乏优秀之作。但是,对集句的产生、发展、流传,以及它的特点和成就的研究,却一直没有引起学术界应有的重视。本文试图通过对集句这一被忽视的特殊文学样式的探讨,引发学术界对集句或其它一些特殊的文学样式的关注,丰富对古代文学的研究。

一、集句之渊源与发展

所谓集句诗,明代徐师曾给它下的定义是:“杂集古今以成诗也。”^[1]就是说,它或汇集古代一家之诗,或荟萃古代数家之诗而创作成一首新的

诗,犹如一件用许多块不同的布料拼成的“百家衣”。那么何为集句呢?推而广之,所谓集句,就是集古代文人的不同诗、词、文、赋中的名言警句,经过重新组合,既保留原有字句的精华,又能别出心裁,另辟蹊径,创造出新的篇章,表达自己独特的思想与情愫。正如《南齐书·文学传》中所称:“全借古语,用申今情。”^[2]

古代集句之主流乃是集句诗,集句诗不仅成就和影响最大,产生也最早。据资料记载,集句成诗可以追溯到晋代傅咸集七种“经书”而成句的《七经诗》。陶宗仪说:“晋傅咸作《七经诗》,其《毛诗》一篇略曰:‘聿修厥德,令终有淑,勉尔遁思,我言维服,盗言孔甘,其何能淑,谗人罔极,有腼面目。’此乃集句诗之始。”^[3]这个观点得到了后代学者的认可,清代黄之隽说:“集句为诗,始晋傅咸。今载于《艺文类聚》者皆寥寥数句,声韵仅谐,刘勰《明诗》不列是体,盖继之者无其人也。”^[4]从

存在主义视野下的“鲁迅杂文”:透视虚无主义倾向

彭小燕

内容提要 鲁迅杂文对一般意义上的虚无主义情景有着广泛的透视、解构;对自觉不自觉地沉湎于虚无的精神倾向也进行了透视,这一透视集中在三个方面:人处在混沌、蒙昧或困惑莫名之中,精神上无所归依;“庄严”、“繁茂”的价值表象背后的本质性“空洞——虚无”;自觉不自觉地倾向于无真正作为、无是非之辨的虚无主义倾向。

关键词 存在主义 鲁迅杂文 虚无主义倾向

彭小燕,汕头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515063

遵循笔者一以贯之的考察逻辑,本文中的“虚无”一词,在一般情形下是取其价值论层面的含义,意指一种缺失真实意义、价值的生存状态,其本身就是一种对于生命的精神性审视。鲁迅杂文对于这一虚无境状的关注是由来已久的。大致地,又可以在相对的角度上分辨出鲁迅杂文对自觉不自觉地沉湎于虚无境状的虚无主义精神倾向的揭示和鲁迅杂文对于人在无是非、无价值坚守、无真正信仰的精神状态中衍生的种种言行举止的透视。这一透视集中在三个方面:首先,是对于人处在混沌、蒙昧或困惑莫名之中精神上无所归依的现象进行了揭示;其次,鲁迅杂文对“庄严”、“繁茂”然而虚幻的价值表象背后的本质性“空洞——虚无”进行了批判;第三,鲁迅杂文对于自觉不自觉地倾向于没有真正作为、没有真实的是非之辨的虚无主义精神意识进行了抨击。

一、揭示人在精神上的混沌、蒙昧

鲁迅杂文多次揭露过所谓“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在“这一类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里,古来不晓得死了多少人物”^[1],“许多烈士的血都被人们踏灭了,然而又不是故意的。”^[2]这实是一类直指人的“虚无——酷虐”境状的言语。鲁迅不仅看到了“杀人群体”、“忘却人众”的残酷,更见出了其深层的精神昏昧——他们仅仅是在无意之间,在并不刻意作恶的“无主名无意识”状态中成了“吃人”的人,对于自身在实际上的酷虐不仁,他们自己是并不知道、并不自觉的。鲁迅杂文也多有直抵人的根本精神仰赖的话语:“但要做解放子女的父母,也应预备一种能力。便是自己虽然已经带着过去的色采,却不失独立的本领和精神,有广博的趣味,高尚的娱乐。要幸福么?连你的将来的生命都幸福了。……倘若思想本领,样样照旧,专以‘勃奚

浅论纳博科夫的死亡主题

戴晓燕

内容提要 本文通过对纳博科夫重要作品的解读,来阐明其小说死亡主题的基本特征。纳博科夫通过让死者保持沉默的方式,既淡化了死亡主题,又在作品中实现了对死亡的深刻探索。这既是纳博科夫死亡主题的基本特征,也是纳博科夫死亡主题长期被忽视的主要原因。

关键词 纳博科夫 死亡 叙述者

戴晓燕,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210097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 (Vladimir Nabokov, 1899—1977)是著名的俄裔美国作家、翻译家和评论家,其主要长篇小说《洛丽塔》(1955)、《微暗的火》(1962)享有很高的声誉,是西方 20 世纪的文学经典之作。在美国文学史上,他被誉为后现代派的领路人。作为重要的文体学家、后现代大师,“其作品的基本内容却一直受到忽视或否定。”^[1]以往研究者较多关注纳博科夫作品中的后现代主义色彩,往往强调时间、自由、意识等后现代主义文学所热衷的主题,而忽视了作家作品中一些传统的文学主题,比如死亡。鉴于死亡主题本身的重要性,笔者以为对纳博科夫死亡主题的研究是必要且是迫切的。

——

的死亡无处不在,但是像托尔斯泰《伊万·伊里奇之死》那样直接描写死亡的作品并不多。他的大部分小说中的死亡主题都是低调的、不显眼的。在叙述中,死亡常常被淡化为故事的背景、舞台,而不是中心事件。纳博科夫淡化死亡主题的常用方法是让死者保持“沉默”。在通常情况下,死者并不是叙述者,他和他的死亡过程只是叙述者叙述的对象。也即,作者不采用死者作为聚焦人物,死亡不是被展示 (showing) 出来,而是被讲述 (telling) 出来的。因此,读者不会有阅读《伊万·伊里奇之死》那样的直观感受,只能相对被动地接受叙述者对于场面、过程的描述。

在流亡柏林时期创作的小说《绝望》(1936)是纳博科夫创作生涯转折点的标志,也是作家的第一部重要小说。主人公赫尔曼是德国裔的俄国人,在捷克他巧遇了一位名叫费力克斯的流浪汉。赫尔曼自认为费力克斯与他长得一模一样,是自己的复制品。于是,他精心策划了一个骗局:试图让费力克斯顶着自己的名字去死,骗取巨额

在论及托尔斯泰时,纳博科夫曾说:“作为思想家的托尔斯泰始终关注的只有两点:生与死。对于一个作家而言,还有什么能比生与死更重要呢?”^[2]他本人又何尝不是如此!纳博科夫作品中

试论乾嘉时期苏州浒墅关的粮食流通

廖声丰

内容提要 乾隆时期，苏州的浒墅关是江南重要的粮食转运中心，粮食商品流通的增加，为浒墅关税收提供了充足的财源；乾嘉之际由于受产粮区商品粮数量的减少、粮价增加、交通条件的恶化以及江南自然经济程度的增加等因素的影响，经过浒墅关中转的粮食大为减少，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近代江南经济的转型。

关键词 乾嘉时期 涉墅关 粮食 商品流通

廖声丰，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后 200433

清代前期的浒墅关是中央户部的二十四关之一，历史地位相当重要。但由于资料所限，清代的浒墅关研究长期难以深入。本文主要通过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关税档案，从商品流通的角度对乾嘉时期的浒墅关进行研究，由此认识当时苏州及江南地区商品经济的实况。

明代运河两岸地区是当时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正德年间，明政府在大运河沿线设立了崇文门、河西务、临清、淮安、扬州、浒墅、北新关等七大钞关，征收过往运河的长途商品税——钞关税。顺治元年，清王朝建立不久，为了解决财政危机，重新恢复了以上钞关^[1]。浒墅关清初由内阁管理，乾隆二十七年（1762），由江南织造兼管，一直到同治四年（1865年）被撤销^[2]，共存在200余年。

浒墅关位于苏州府长州县，“为扬关、浙关

（指北新关——笔者注）、浙海关等处中道，凡南货北行，北商南贩最为衡衢”^[3]。两江总督对浒墅关重要性的评价是：“浒关向为商贾辐辏之地，上达苏、松、嘉、湖各府，下由常州、镇江一带，出口皆系必经之路。”^[4]浒墅关各口岸还控制了“沿海四港”即吴淞港、浏河港、白茆港和福山港的船舶进出口^[5]。即以苏州府而论，浒墅关也处在一个诸水向心汇聚的交通枢纽上，它扼控新塘桥港、黄埭港、射渎港、枫桥港等处南来北往，西行东去的各类商船。因此浒墅关的地理位置在清代江南地区具有重要地位。

清代前期，长江是最重要的东西商品交流的大动脉，通过这条大动脉，云贵、湖广、四川、江西、安徽等内陆省份与沿海地区相互联结，形成了密切的商品交换。大宗的商品主要有粮食、木

该文认为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清代榷关研究》（批准文号2004ELS002）的阶段性成果，并受2007年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资助。

南洋劝业会与晚清社会发展

洪振强

内容提要 1910年南洋劝业会是近代中国第一次全国规模的博览会，它既是晚清社会趋新发展的结果，反过来也推动了晚清社会发展。南洋劝业会通过构建庞大而完整的筹备组织网络和进行民族主义的宣传动员，极大地增强了社会凝聚力。中西合璧的展馆建筑和注重社会趋新发展的展品征集体现了一种求新求发展的愿望。作为一项大型的社会公共活动，南洋劝业会不仅促进南京市政建设，而且拓展了社会公共活动空间，使晚清市民社会得到一定程度的培育和发展。此外，南洋劝业会所进行的展品审查给奖和品评研究也有利于促进社会经济发展。

关键词 南洋劝业会 社会发展

洪振强，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 430079

1910年6月5日至11月29日在南京举办的南洋劝业会是有清一代唯一一次全国规模的博览会，是“我中国五千年未有之盛举”^[1]。自上世纪80年代学界就开始关注它，研究成果主要涉及到其的筹备、举办、影响等综合情况，以及其华侨、绅商、端方、陈琪等重要人物的作用和中日美三国间的国民外交，等等^[2]。南洋劝业会既是晚清社会趋新变化的结果，反过来也推动了晚清社会的发展。1908年11月，两江总督端方和江苏巡抚陈启泰合奏举办南洋劝业会时，说劝业会“以振兴实业、开通民智为主义”，“以期于实业前途大有裨益”^[3]，具体负责南洋劝业会筹办事宜的陈琪也言劝业会的宗旨是“一、振兴全国实业；二、建造南京市面；三、辅助社会教育。”^[4]那

么，南洋劝业会从筹备宣传到会场展品，以及具体开办活动，是否体现了这些目的和宗旨呢？

一、筹备网络与宣传动员加强社会凝聚力

南洋劝业会举办于晚清社会动荡不安之际，不进行精心的筹备动员，就难以达到预期目的。因此，筹办者一方面建立严密的筹备组织网络，另一方面利用民族主义进行宣传动员，吸引全社会特别是绅商对南洋劝业会的关注。

1909年，南洋劝业会开始筹备，形成了一个以南京为中心，远及东南亚的完整的筹备网络。两江总督端方认为“赛会一事，实与开浚智识，导扬风化，具有无形之感应，而于国计之盈虚，民生之丰啬，尤息息相通，其关系良非浅鲜”。因此，奏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与世界博览会——历史与现实的双重启示”(06JJD770013)的阶段性成果

黃陈之交与辛亥癸丑之役

莫永明

内容提要 黄兴和陈其美是“多年患难之交”，辛亥之役前后，两人意见一致，交谊甚深；但至癸丑之役后，黄、陈政见发生严重分歧，感情几近破裂。“宋案”以后“武力讨伐”和“法律解决”的反袁方略都是对中国国情缺乏认识的错误选择。癸丑之役是一种冒险主义行动，黄兴反对冒险主义，不应受到指责。陈其美总结和反思癸丑之役，完全赞同和全力支持孙中山重建中华革命党，竭力推颂孙中山的权威主义，与黄兴的非权威主义尖锐对立，彼此间的矛盾，无法调和。这是黄兴和陈其美这对“谊逾骨肉”的“患难之交”走向分裂的重要缘由。但黄、陈反袁目标一致，陈遇害后，黄诚挚地表示了对这位故友的伤悼怀念之情。

关键词 癸丑之役 黄兴 陈其美

莫永明，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210013

辛亥至癸丑年间，黄兴和陈其美的公谊私情犹如“骨肉”相连，是“患难之交”^[1]；但癸丑之役后，两人政见发生严重分歧，感情几近破裂。1916年5月18日陈其美被袁世凯派人在沪杀害，为国殉难，远在日本的黄兴闻讯后“极为惨痛”，在唁电、挽联中将陈誉为“长城”，高度赞颂这位故友的功绩，对彼此间的交谊不胜怀念^[2]。本文拟对辛亥癸丑之役前后黄陈交谊及其变化的缘由略作探讨。

—

黄兴和陈其美于日本结交。1906年秋，黄兴从广西、南洋筹款抵东京时，正值陈其美留学日本不久。1906年冬陈加入由黄兴主持本部工作的同盟会。陈在东京留学期间，“遍交俊杰谋

国之士”^[3]，结识了黄兴等革命党人。是时，黄、陈地位悬殊，黄是同盟会的主要创建者之一，又是同盟会本部的实际主持人，而陈地位一般，两人交往也不多。但随着革命的发展，特别是陈其美回上海后“秘密勇进”，“奔走革命”^[4]，从默默无闻一跃而成为蜚声沪上的著名革命党人，彼此间的联系加强，交谊日趋深化。在辛亥之役的艰难岁月里，黄兴和陈其美患难与共，英勇奋战。陈其美称他与黄“谊逾骨肉”^[5]，确是实话。

中国同盟会成立后，革命党人陆续奔赴各省活动。黄兴等人具体策划粤、桂、滇反清起义之际，陈其美受同盟会指派，从日本返回上海，秘密联络同志，组织革命机关，培育军事人才，在江浙一带开展革命活动，声援黄兴等人所发动的反清斗争。例如，黄兴、赵声等领导的辛亥

民国首任临时大总统选举会代表人数人员考

薛 恒

内容提要 参加民国首任临时大总统选举会的各省代表会代表人数和人员长期以来一直有多种说法,本文对诸家之说进行了确切的鉴别和考证,进而依据当事人吴景濂的记载得出了出席这次选举会 43 人的名录。

关键词 临时大总统 选举会 人数

薛 恒,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210044

1911 年 12 月 29 日上午,在辛亥革命中为筹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而设立的“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以下简称为“代表会”),在南京市丁家桥原江苏省咨议局会场开会,举行了选举第一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选举会(以下简称为“选举会”)。会上,来自奉、直、豫、鲁、晋、陕、苏、皖、赣、闽、浙、粤、桂、湘、鄂、川、滇等 17 个省的代表,以每省一票、总计 17 票中的 16 票选举了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这次选举在“群雄并起”的革命时局中,史无前例地用民主选举的方法和程序确立新国家的临时元首,掀开了中国政治发展史上政治现代化的崭新一页。

关于这次具有历史里程碑意义的选举会,其参会的代表人数及人员,长期以来众说纷纭。史书和史料中的记述计有 43 位代表、44 位代表、45 位代表和 49 位代表等说法。为大多数历史著作所持有的主流看法是 45 位代表之说^[1]。考虑到诸说之间最大的出入有 6 位代表之多,占选举

会代表总数的 12%—14%,而选举会时间至今还不到百年。因此,有必要对这次选举会的代表人数和人员作一考证和澄清,以明史实,并补缺憾。

一、史著叙述与文献资料记载

叙述清末民初临时大总统选举会最具权威性且比较早的历史著作是民国时期许师慎著的《国父选任临时大总统实录》。该书在 1948 年 4 月由中国文化服务社出版。许师慎曾长期在国民政府要员身边速记有关重要讲话,1949 年随国民党去台后成为台湾省速记界的耆宿。许更为重要的身份是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担任中国国民党中央史料征集委员会主要负责人,一生在中国国民党党史研究领域著述甚丰。《国父选任临时大总统实录》是许师慎得到国民党官方肯定,专门回顾孙中山选任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的“正史”性著作。该书对于出席这次选举会的代表和人数并开会情况写道: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科重大研究项目《北洋政府政治改革》课题(05JJD770110)阶段性成果

“联俄”与“容共”

——1920年代大革命前中国政局的再探讨

尚红娟

内容提要 “联俄”与“容共”虽是在1920年代先后发生的两件事，但却实为一体。因为联俄容共政策的确立是为孙中山与苏俄追求不同目的的一种利益结合。孙中山为了苏俄的军事财政援助做出了两难的抉择：“联俄”亦“容共”；苏俄为了苏维埃革命在东方的实现，以“共产主义不能在中国”而“联孙”的同时，推出了“斯内夫利特战略”，将其对华的双重策略以国共合作的形式巧妙地结合。于是，“容共”成为了双方相互考量、目标实现与否的关键所在。而联俄与容共之间的这一微妙关系则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1920年代大革命前中国政局的发展。

关键词 联俄 容共 孙中山 苏俄

尚红娟，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 200433

联俄与容共虽是孙中山在1920年代先后完成的两件事，但却实为一体，二者互为条件，相辅相成。孙中山的联俄容共政策，将大革命前的中国共产党、国民党、苏俄、共产国际四者紧密联系在一起，构成了一张复杂的关系网，而国民党内部也因此纠纷不断，呈现出派系分裂的局面。

联俄的初期，孙中山、苏俄、共产国际和中共围绕国共合作问题，特别是在合作的具体形式上，存在着严重的分歧。但最终，由共产国际推出的国共合作却是由苏俄与孙中山支配，中共则成为双方交易的“筹码”，处在被忽略和被支配的弱势地位。这样，国共发生冲突时，被国民党“容纳的共产分子”多处于第三者的地位，正面交锋的双方主要是在对“容共”表示反对或不满的国民党元老与孙中山、苏俄顾问鲍罗廷之间。容共初

期，国民党内的反对“容共”案多被孙中山以个人的威信抚平，而鲍罗廷又得宠于孙中山，所以他在国民党内“加强孙中山的左派立场，分化右派”的工作进展非常顺利；但在孙逝世后，国民党中央出现权力真空，为了将汪精卫扶持为孙的合法继承人，确保“联俄容共”政策的继续，鲍则制定了“加速国民党分裂，彻底清除右派的”活动计划。于是，鲍罗廷与右派中央委员之间展开了赤裸裸的权力斗争，最终导致了国民党内部在1925年的三次大分化。如果说冯自由在北京成立的国民党俱乐部是国民党右派分裂中央的第一步，那么廖案发生后，许崇智、胡汉民的被迫离粤，林森、邹鲁的被派北上则是鲍罗廷彻底肃清右派分子的一大胜利；而西山会议的召开则标志着鲍罗廷加速分裂国民党目标的实现。本文拟就以“联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军粮供应评析

张燕萍

内容提要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为了保证对军队的粮食供应，在前期实行了粮饷合一、屯粮价拨制度，在中后期实行了粮饷划分、主食公给制度，特别是在大后方粮食紧张、粮价高涨的情况下，通过实行田赋征实制度，从而掌握了巨额的粮食，对于满足部队官兵的基本生活需要、坚持抗战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当然，其粮食管理政策的失误及粮食运输方面的问题，也在一定程度影响了军粮供应的成效。

关键词 抗战时期 国民政府 军粮供应

张燕萍，解放军南京陆军指挥学院副教授 210045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根据粮食市场的供求状况在抗战前期实行了粮饷合一、屯粮价拨的军粮供应制度，在抗战中后期实行了粮饷划分、主食公给的军粮供应制度，特别是在大后方粮食紧张、粮价高涨的情况下，实行了田赋征实制度。通过田赋征实，国民政府手中掌握了巨额的粮食，保证了部队官兵的主食公给，对于满足部队官兵的基本生活需要、坚持抗战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一、粮饷合一、屯粮价拨与抗战前期的军粮供应

从抗战开始到1940年2月，国民政府军粮供应实行的是粮饷合一、屯粮价拨制度，即官兵的主、副食费和饷金，列入同一预算，部队所需的军粮或者由政府发给米津，部队就地采购，或者由军需机关购买粮食，价拨给部队，但政府拨发饷银的方式不变，所购粮款仍在饷款内扣缴，所

以称之为“价拨”。担任作战或特殊勤务的部队，也常有补助米津或发给现品之事，但多为补助或赏与性质，仍随同经费发给。

1937年8月，后方勤务部成立，隶属于军事委员会，负责粮秣、被服、弹药及其他军需品的运输、储备和补给。后方勤务部按各战区部队的驻地和所需粮秣数量核定屯储粮食的地点和数量，需要时，由各兵站运输补充给各部队。其时军粮补给采取了现品与米津相结合的办法，凡是到达战地直接担任作战任务的部队及从征机关，均由军政部或战区司令长官部核定人数，由兵站按照定量标准发给现品；奉令参战向战地开进途中或已参战但因运输困难无法接济现品，而当地有粮可购的，则发给米津和马料费，由部队就地采购。

抗战前期，特别是1937—1938年，全国大部分省区粮食丰收，而战区又多是粮食产区，因此，军粮来源充裕，不论是军政部、后方勤务部购备

流通革命与中国流通产业结构调整及现代化研究

南京财经大学徐从才教授主持完成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流通革命与中国流通产业结构调整及现代化研究”(项目批准号:01BJY070)近期结项,成果鉴定等级为良好。

该成果从流通革命的历史演进和逻辑发展过程出发,探讨了流通革命的内涵及其表现形式,并结合我国流通业发展的实际,探讨了在流通革命背景下我国流通业如何通过结构调整和组织创新来培育新的国际竞争力。成果的主要内容是:

1、系统阐释了流通革命的历史演进和表现形式,指出流通方式是产品或劳务由生产领域向消费领域运动的客观状态以及所采取的具体运动形式的反映,体现着流通载体与生产者和消费者的适应关系,是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在流通中的具体表现,因而,流通革命可以定义为“受产业革命与消费革命制约,并对产业革命和消费革命起能动作用的流通方式变革”,其表现形式主要是流通结构调整和流通组织创新。在历史上,与大量生产的工业革命和大量消费的消费革命相联系,出现了以连锁为特征的第一次流通革命。当前,与信息革命和个性化消费相适应,又开始出现了以电子商务为特征的第二次流通革命。

2、分析了流通结构的调整。根据不同的部门划分,主要从零售业、批发业、物流业这三方面,对流通结构调整做出了针对性、具体性、现实性的论述。零售业:布局结构上的调整趋势表现为功能多样化和城乡一体化,业态结构上的调整趋势表现为传统与现代的整合,技术结构上的调整趋势表现为向多元复合型的转变,竞争结构上的调整趋势是从过度竞争转变为有效竞争;批发业:结构调整目标是建立以配送中心为结点的增值网,将资金调配视为流通领域的一个由制造业、批发业、信息业和银行之间相互协调的系统工程,通过发展连锁经营,以及依赖电子订货系

统和配送系统进行商品优化配置来获得新生。在现代经济条件下去明确批发业的定位,对批发企业商品流通渠道诸环节之间进行流程再造,建立一个高效的流通网络体系;物流业:社会化是物流业的发展趋势,系统化是物流业发展的前提,信息化是物流业的发展目标。具体而言,物流业的结构调整要落实在制度创新、组织创新与技术创新之上。

3、分析了流通的国际化。指出流通国际化具有两方面的动因,一方面是由于市场需求正在向着多样化、国际化的趋势发展,消费者对于具有异国经济、文化特征的商业服务产生了广泛的需要;另一方面则由于各国大型流通企业为克服国内市场饱和的局限性,有着向国外拓展以寻求新的市场空间的强烈动机。从动态的视角出发,流通国际化不仅仅只是某一国在某一时点上的流通领域经济活动国际化的程度,而是包括有流通领域对外开放、流通企业跨国经营以及与此相关的政策法规制定的过程。

4、分析了流通组织创新。指出流通组织创新是流通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为适应生产与消费诸要素以及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而对商品流通环节、方式及手段进行改造或重新塑造的过程。在引入市场规则的条件下,流通组织创新可以从产权关系与契约关系变动的角度来加以理解。从组织形式变动的角度看,流通组织创新就是企业边界的重新划定。我国流通组织创新的形式具有多样化的特性,包括商业连锁公司、供应链组织、流通合作、新型商人雇主制与商品交易市场等。

5、分析了流通的现代化。指出流通革命的根本目标就是要实现流通现代化。首先必须进行流通体制转型,从原来行政性分配式的流通体制转变为宏观调控下的自由流通体制,实现这一目标的过渡措施就是大力推进流通市场化和市场制

度化建设的进程；其次，商品交换与商品流通发展的必然结果就是交换关系不断扩大和流通范围不断扩展，由此而产生了交易关系的信用化，必须对各种信用化的交易关系进一步法制化；最

后，流通现代化的一个显著标志是流通方式信息化，这种信息化主要是建立在标准化、自动化基础上的网络化，具体表现为电子商务的不断发展与完善。

我国转型期的竞争与社会风险研究

江苏省委党校冯必扬教授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我国转型期的竞争与社会风险研究”（项目批准号：02BSH037）近期结项，成果鉴定等级为良好。该项目最终成果是专著《不公平竞争与社会风险》，2007年6月由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该成果的主要观点是：

1. 我国的社会转型与竞争之间具有相互制约关系。从竞争的视角看，我国的社会转型实质上是由垄断型社会走向竞争型社会的过程。一方面，我国社会转型开始于竞争机制的引入，另一方面，竞争在我国得到普遍认同源于社会的转型，在社会转型之前我国一直是一个排斥竞争的社会；目前竞争存在不规范、不公平以及被限制等现象，而我国社会转型的顺利完成，有赖于公平竞争的制度和理念的确立。

2. 不公平竞争会带来社会风险。竞争能带来繁荣，也能带来风险。但并非所有的竞争都会导致社会风险。公平竞争由于其规则公平、过程公平、结果公平，所以，它既会给社会带来活力，又会促进社会稳定。只有不公平竞争才会导致社会风险。该成果把竞争损失分为自致性损失与非自致性损失、有补偿损失与无补偿损失。不公平竞争对竞争主体而言，主要表现为竞争损失为非自致性损失或无补偿损失，由于其损失并非竞争者主观所造成或者竞争者对其损失难以承受，因此，其竞争损失者就会产生不公平感，就会产生反叛社会的行为，从而导致社会风险。

3. 不公平竞争是我国目前社会风险的主要来源。目前我国社会存在大量的不公平竞争现象，无论在经济领域，还是在教育、文化、卫生等领域都存在不公平竞争。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我

国过去长期是垄断型社会，一直在排斥竞争，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才在各行各业逐步引入竞争机制。但由于竞争在我国呈现出先引入、后确立规范的过程，因此竞争在我国目前有的没有规范，有的虽有规范但不公平，有的虽有公平的规范但没有严格执行，所以，竞争就难以公平；二是目前我国仍处于从垄断型社会走向竞争型社会的过程中，仍然存在各种垄断现象，在许多领域垄断仍然是配置社会资源的主要方式。垄断是对竞争的排斥和否定，在垄断的条件下，竞争一方面被限制，另一方面只能以隐蔽的、不规范的方式存在，所以，必然会出现各种不公平竞争。由于我国目前存在着不公平竞争，这就产生了许多社会问题，像贫富差距急剧拉大、社会流动不自由、社会断裂等都是不公平竞争的结果。不公平竞争会导致社会风险，大量的不公平竞争会形成叠加效应，更容易产生社会风险。

4. 要防止不公平竞争，就要建立公平竞争的制度、确立公平竞争的理念。要有效防止各种不公平竞争，就要建立一整套保障竞争起点公平、过程公平、结果公平的制度，这是防止不公平竞争的前提和必要条件。但是仅有制度不行，还必须在全社会确立公平竞争的理念。这是因为，只有当全社会普遍确立公平竞争的理念时，公平竞争才能成为人们的主要价值追求，才能成为人们的自觉行为，只有这样公平竞争的制度才能真正得以执行。

该成果的学术价值是：对我国社会转型期竞争引发社会风险的内在机理进行了开拓性研究，为在我国社会转型期防止不公平竞争引发社会风险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践路径。

科学的内在指标研究

东南大学马雷教授承担的2005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科学的内在指标研究》(项目批准号:05BZX025)近期结项,成果鉴定等级为良好。最终成果为专著《科学的内在指标研究》。该研究成果的主要观点是:

1、科学的内在指标只有在理论比较中才能建立起来。理论比较不是纯逻辑的比较,不是理论具体内容的比较,也不单纯是理论的解决问题的数量和权值的比较,而是协调力的比较,即理论解决问题的方式和力度的比较。理论解决问题的方式和力度具体表现为科学指标,如简洁性、统一性、精确性等,它们都可以通过非对称性的冲突与协调关系在一种统一的意义上精确地定义,即通过“问子”和“解子”的概念来统一定义。对于定义牵涉的问子数和解子数的统计学难题,成果提出基本的统计原则,包括以史为据原则,问题限定原则,时间限定原则,内容消去原则,分层分类原则等。

2、科学的内在指标有两类,即经验指标和概念指标。经验指标包括10个子指标,这10个评估指标共同构成理论的经验协调力。理论的重要性部分地由理论的经验协调力决定,与理论经验协调力成正比;概念指标也包括10个子指标,这10个评估指标共同构成理论的概念协调力。理论的重要性部分地由理论的概念协调力决定,与理论概念协调力成正比。经验指标和概念指标都可以在一种统一的意义上得到精确的定义,并为建立统计学模型提供必要的基础。单一的经验协调力和单一的概念协调力都具有同等地位,增强理论的经验协调力与增强理论的概念协调力都是增强理论协调力,间接把握真理的手段。协调力大的理论具有更大的真理性。

当理论面临某个方面的经验冲突时,并不意味着一定要放弃该理论,但可以对该理论表示怀疑。另外,一个理论在一定历史时刻或时段被放弃的合法理由是该理论的综合协调力和局部协调力都面临着冲突。

3、从科学指标的内在逻辑出发,可以将科学

理论划分为经验理论和概念理论。概念理论包括亚经验理论、工作理论和超理论。经验理论和亚经验理论总称为具体理论,工作理论和超理论总称为抽象理论。从理论构成的角度看,理论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单一理论、复合理论与集合理论。一个单一理论的成败取决于它所属的复合理论或集合理论;一个单一理论在某个复合理论或集合理论中的成败并不意味着它一定在其他复合理论或集合理论中的成败。一个失败的复合理论或集合理论可能通过修改或替换其中的单一理论获得成功。在集合理论与其构成理论之间,在工作理论与其例示理论之间,在超理论与其例示理论之间都存在着对称性的冲突与协调关系。具体理论与工作理论的分离,工作理论本身的进化、分解和综合与各层次理论之间的对称性冲突与协调关系密切相关。

4、协调论真理观不同于符合论、融贯论和实用论三种真理观,但又兼具三种真理观的优点。在协调论真理观中,经验协调吸取了符合论的优点,概念协调吸取了融贯论的优点,背景协调则吸取了实用论的优点。但是,协调论真理观又反对符合论、融贯论和实用论各自走向极端,相互排斥。协调论真理观并不反对预设一个科学进步的终极目标,但它从来不企图完全抵达这种目标,它只要求在时间的推移中,在冲突与协调的动态关系中去逐步地接近目标。因而,协调论真理观实现了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的统一。与传统真理观不同,协调论希望在更高的层次上将进步、合理性和真理三者统一起来。协调论认为,理论的合理性在于其协调性,凡是协调的就是合理的;科学进步在于理论协调力的不断增强;理论的真理性在于理论具有较强的协调力,一个理论,它的协调力越强,越进步,就越具有真理性。

在任一历史时刻或时段,那些在协调力上较强的科学相对成熟,那些在协调力上较弱的科学则相对不成熟。两门科学相比,在局部协调力上占优势的科学是局部成熟的科学,在综合协调力上占优势的科学是综合成熟的科学。

中国西部农业开发的历史思考

南京农业大学惠富平教授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西部农业开发的历史思考”（项目批准号01BZS031）近期结项，成果鉴定等级为良好。项目最终成果是专著《中国西部农业开发史研究》。该成果的主要观点是：

1、历史时期西部农业开发的盛衰变化受到各种自然和社会因素的影响，与国力强弱及经营策略有直接关系。从上古至明清，我国西部的农业开发随时代的变迁而起伏，三次农业开发高潮分别出现在汉、唐盛世和清代前期。历代王朝的农业开发手段均以移民屯田、兴修水利为主，牲畜牧养、优良动植物品种的引进推广、农业技术革新及农业经济关系调整也是农业开发的重要内容。民国时期也曾兴起西部开发热潮，只是近代中国政治动荡、经济凋敝，经济开发难以有效实施。实施西部大开发，应充分考虑当地的自然资源禀赋和社会发展现实，首先重视西部地区的农业开发和生态环境建设。

2、边疆屯田是古代西部农业开发的重要形式，戍军移民就地开荒种粮，减轻了粮草长途运输的巨大负担，有利于巩固边防，也促进了当地的经济进步。政府出于政治、军事目的而组织的西部移民屯田主要包括军屯和民屯两种方式，经营管理措施则多种多样，其中包括为移民创造必要的生产、生活条件，减免租赋等。但是古代屯田的军事性和经营管理方面的种种弊端，严重影响屯兵移民的生产积极性，屯田效果往往不很理想；加之边疆地区耕作栽培比较粗放，粮食产量的增长主要是通过开垦土地来实现的，由此带来水土流失、土地沙漠化等生态问题。

3、西部水利建设在农业开发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很早就形成了将灌溉效益与生态效益相结合的历史经验。古代大型水利多依靠政府兴建，中小型工程则以屯田水利和私人投资等方式在边疆地区推进。关中地区的郑国渠、成都平原的都江堰、宁夏引黄灌区的唐徕渠、新疆绿洲的坎儿井等均是西部历史上著名的水利工程。在长期

的水利实践中，西部各地逐步形成大量切实有效的引水灌溉经验及管理措施，保证了水利事业正常作用的发挥。但也应看到，历史时期的社会动乱、政权更替等原因使西部水利事业兴废无常；河套地区、新疆绿洲则因不合理的灌溉造成土壤盐渍化。

4、西部地区曾注重农业技术革新和域外优良动植物品种的引进、推广，抗旱耕作技术以及稻作技术长期居于全国领先地位。秦汉以后，西部农业地域不断向外拓展，西北地区以抗旱保墒为特征的耕作栽培技术时有创新。唐宋时期，全国经济重心南移，当地农业技术进步失去了外在推动力，西部地区的农牧技术只在原有基础上艰难发展。清代前期，西部农耕区再次向新疆等地拓展，粮食生产有所增加，缓解了人口压力所带来的社会问题。优良动植物品种的引进、推广是历代西部农业开发的重要举措，西部历史上曾形成多次引种高潮。大量优良动植物品种在西部地区的引进和推广，对当地农业生产结构调整及农牧业开发具有积极作用。

5、在历史早期，西部人口有限，人类农耕活动对生态环境的压力较小，加之生态环境具有自我恢复的能力，所以生态环境并没有发生多少变化，黄土高原等地的生态环境基本维持良好。秦汉以后，大规模的农田垦辟和游牧活动，对西部边疆的生态环境造成了很大破坏，出现森林、草地消失，水土流失，土地沙漠化、盐渍化，水源枯竭等各种不良生态后果。西部农业开发史说明，边疆的农牧业经济开发必须与环境整治同时进行，应根据区域自然资源特点，农牧林草各有侧重，将农业开发与生态环境建设紧密结合起来。对于不宜实施经济开发或需要进行生态恢复的地区，应严加保护、认真治理。

（本栏目由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供稿）

[责任编辑：平 喆]